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丝路贸易在唐代金属酒器设计制  
造中的价值研究

研究生姓名: 费小宝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高兴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设计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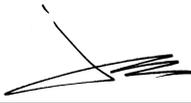
研究方向: 设计历史与理论

提交日期: 2022年5月31日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费小宝 签字日期： 2022.6.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20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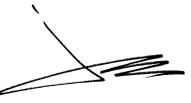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费小宝 签字日期： 2022.6.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2022.6.

# **Study on the value of Silk Road Trade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gold and silver wine vessels in Tang Dynasty**

**Candidate : Fei xiaobao**

**Supervisor: Gao xing**

## 摘要

唐代金银酒器一定程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承载了大量有关唐代丝路贸易的历史信息。通过这样一个观察点可以获知丝路贸易带给唐朝的多元影响,例如,可以从金银酒器设计制造的演变发展观照唐代设计制造融合中西文化以及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方法。对此选取了唐代丝路贸易状况、金银酒器出土情况、金银酒器的设计制造等方面加以探讨研究,并形成如下认知:首先,丝路贸易的繁荣加速了西方金银酒器输入唐朝的速度以及金银酒器所裹带的文化习俗、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同时带动唐朝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正向推动了这一时期金银酒器的本土化进程。其次,唐朝北丝路兴盛时期,金银酒器经历了从输入到仿制两个阶段。但随着北丝路衰弱南丝路崛起,金银酒器吸收了西方金银酒器中的优点并开始逐渐融入中国传统因素,从纹样到形制都实现了中国化再创制,迎来本土化发展新阶段;最后,丝路贸易从材料来源、工艺、形制和纹样等方面对唐代金银酒器设计制造产生相应影响。

从唐朝金银酒器设计制造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丝路贸易不仅是经贸之路还是文化交流之路,它增强了唐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包括金银酒器设计制造在内的多种实践类别的中西融合。对这一历史史实的研究,为现阶段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外文化交互融合之道提供了相应的参照。

**关键词:** 唐代 丝路贸易 金银酒器 价值 设计制造

---

## Abstract

The gold and silver wine utensils of the Ta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times to some extent, carrying a lot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lk trade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can know the influence of the Silk Road trade on the Tang Dynasty. For example, we can learn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gold and silver winery. Firstly, 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accelerated the speed of the Western gold and silver wine import into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exchange of culture, custom, religion, art and so on. At the meantime, it promoted the flying start of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promoted the localiz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wine in this period. Secondly, during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s went through two stages from import to imitation. However,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North Silk Road and the rise of the South Silk Road, the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s absorb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Western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s and began to blend into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of China. From patterns to shapes, the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s were made in China, ushering in a new stage of localized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silk trade had a corresponding impact o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material sources, techniques, shapes and patterns.

---

From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s in the Tang Dynasty, we can see that the silk trade is not only the road of trade or the road of cultural exchange,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ties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practice including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s. The study of this historical fac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under the current trend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 Silk Road Trade ; Gold and silver wine ware of Tang Dynasty;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Fusion; Innovatio;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 目 录

引 言 .....	1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一）研究背景 .....	1
（二）研究意义 .....	2
二、研究现状 .....	2
（一）与金属酒器相关文献 .....	2
（二）与唐代丝路贸易相关文献 .....	4
三、研究方法 .....	6
<b>第一章 唐代丝路贸易往来 .....</b>	<b>7</b>
一、唐代丝路贸易概况 .....	7
二、北丝绸之路 .....	9
三、南丝绸之路 .....	11
（一）以西南、东南为主的陆上丝路 .....	11
（二）海上丝路 .....	13
<b>第二章 唐代出土金银酒器与丝路贸易的简况 .....</b>	<b>16</b>
一、北方出土金银酒器与丝路贸易 .....	22
二、南方出土金银酒器与丝路贸易 .....	24
三、唐代金银酒器类型概述 .....	25
<b>第三章 从唐代金银酒器设计制造中解读贸易 .....</b>	<b>33</b>
一、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设计制造材料中的价值 .....	33
二、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设计制造工艺中的价值 .....	35
三、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造型设计中的价值 .....	41
四、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纹样设计中的价值 .....	53
<b>结 语 .....</b>	<b>61</b>
<b>参考文献 .....</b>	<b>62</b>

**后记.....64**

# 引 言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本选题来源于对高兴教授在《设计伦理研究》一文中：“设计实践中的价值趋向多元化”<sup>[1]</sup>观点的思考。金银皆为人们所发现和应用最早的贵金属，由于化学特性相对稳定、延展性较强，是制造以及装饰酒器的理想材料。也因为当时金子和白银的储量相对稀少，所以金、银器从被发现的第一天起就和其他材料的酒具有着根本的差异，是一种华美、荣华的表现，同时又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体现。因此从金属酒器中选择了最具典型性以及出土存世数量较大的金银酒器作为研究重点。在唐代之前，金银酒器的工艺远远低于中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以国内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中国出土最早的黄金制品比整个地中海区域还晚了一千年。而在商周时期，青铜酒器也曾是社会活动的主角，其形制、工艺、纹样等所表现的价值观念，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开创了以凝重、深沉闻名于世的中国青铜社会主义文明。此时的金银仅作为装饰之用。而后在秦汉时代，由于仙道思想的兴起，以金和银入药炼丹后食之或以之为食具便可长生不老的观点根深蒂固。到了唐代，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交流频繁、丝绸之路的建立导致西方金银制品不断涌入中国，与此同时通过丝路贸易，西方酒文化在与唐朝交流过程中，其文化交流也逐步被唐朝酒文化吸收融入，从而致使唐朝酒文化在原来的基础上内涵更为丰富，酒文化的兴盛带动了酒器的发展。沉寂许久的金银酒器飞速发展，唐朝是我国古代金银酒器发展史的巅峰时期。初唐时代，黄金和白银的采矿、熔炼、制作均为官府垄断，金银酒器大多朝贡而来，由官作进行模仿制作金银酒器。唐中后期以来，随着唐朝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给社会各阶层创造了使用金银制品的条件，金银酒器开始大规模流入民间。金银酒器的制造和使用，已从皇亲贵戚的专属酒具延伸到了普通民众，并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用金银酒器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及金银酒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金属酒器的发展时至唐朝，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物

[1] 高兴. 设计伦理研究[D]. 江南大学, 2012.

质意义了，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发展的历史具有阶段性、空间传播性和历史继承性。从一定的历史时期或一定时期产生的酒具，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一个侧面的反馈。因此，金属酒器与丝路贸易的内在关联成为了研究唐代社会历史及文化生活无可回避的内容题材和线索。

## （二）研究意义

当前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注重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由于金银器质地贵重、外观富丽，而且有着实用、观赏、以及货币等诸多价值，虽然当时只为极少数人所拥有，但领导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潮流，加之对外来艺术元素的吸收，使唐代金属器的形制、纹样和工艺技术呈现出一番繁荣景象。唐代金属器的形制多种多样，其中酒器的独特设计更是代表了唐代金银器设计的流行风尚，并兼之精良的工艺和制造，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传承延续两千多年历史，承载了中国与众不同的文化。如今，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现代社会大环境下，开始大力发展“一带一路”重提丝路贸易。唐代金银酒器发展和丝路贸易文化交流都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国内外学术界也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展开深入研究。在丝路贸易交往频繁的唐代，金银酒器一方面是在对中外文明吸纳、融合和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精神思维、宗教信仰等多样化的发展走向，形成了一个打破传统观念禁锢，逐步走向世俗化、大众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从外来文化因素和精神思维中所反映的文化创新力，在金银酒器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据此，对唐代金银酒器发展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人们以全新的视角理解丝路贸易文化的传播以及与中西文化的交往融合。知古鉴今，以便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提炼新方式，为现阶段全球化趋势影响下的中外文明交融提供有益参考。

## 二、研究现状

文献经过筛选，得到了与本研究关联比较紧密的相关资料，现将其归类分析如下：

### （一）与金属酒器相关文献

英格兰的 B. L. 霍伯森是第一个深入研究中国唐代金银器的英国研究者，他首次发表有关中国洛阳北邙的十五件唐代金银器研究的论文，目前这些金银器都在不列颠博物院珍藏。此后，关于国外博物馆所藏同时代的黄金器的有关论文也不断出版，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重视。日本政府也在同一时期发行了《正仓院御物图录》《东瀛珠光》，以及一些日本国内其他地区的唐代金银器物研究论文。此后，藏在日本、海外的唐代金银器作品不断发布，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日本学家梅原末治、原田淑人、岩田茂作、加东繁，以及德国学家 A. 格拉夫施特拉赫维茨等人完成了最初的研究。当时，他们都是分别对一些器物加以研究，并在确认了相关藏品为我国唐代器物的同时，也认为与阿契美尼德帝国萨珊王朝金银工艺有很大的关联。一九五七年，瑞典学者俞博撰写了《唐代金银器》一文，搜集了当时所能看到的在世界各地收藏的唐代金银器，及其有关的石雕、壁画、织物、陶器以及西方金银器，并经过比较分类，阐述了唐代金银器的四大风貌(即我国传统风格、波斯萨珊风情、印度风情、我国唐代创新造型)，并率先完成了我国唐代金银器的分期。俞博首次全面、综合地考察了唐代金银器，涉猎范围相当广阔，对中国后来的学术研究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以传世物为研究对象，二是以外籍人士为主；二是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注重中西文化交流。随着唐朝金银器的持续发掘，为唐代金银器物的研究，提供了大批的实物数据，使中外学者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其深度与广度均高于以往。

国内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出现于 1989 年，学者韩伟对中外唐代金银器造型纹样等方面进行汇总和分析。相隔十年后，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学者齐东方连续发表了对唐代金银器深入研究的书籍以及数篇关于唐代金银酒器的专题研究论文，证实唐代金银酒器与西域各国有密切关系。其研究内容随后陆续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学者扬之水在《晚唐金银酒器的名称与样式》等一系列文章中，专门系统论述了唐代金银酒器的分类和造型描述。认识唐代金银酒具，还须从有关唐代金银器的研究中获得有益信息。经过深入的分类筛选，现可将其主要分成如下几种：第一种是以考古学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在王雪的《唐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中，编者对中国历年以来在墓葬、窖藏中所发现的唐代金银器器物进行了分类整理，内容涉及了饰品、器物、佛教用器等诸多方面，为论

文在数据整合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通过了解中国唐代金银器的出土发掘,中国目前留存的唐代金银器一般都是通过窖藏发掘,最主要的三个发掘地依次为江苏镇江的丁卯桥窖藏、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窖藏,以及陕西省扶风的法门寺定陵地下皇宫。三大发掘出土的黄金器数量之多,精品量的比重之高,显示了唐代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也体现了各地作坊与中心作坊以及我国北部与南部作品之间的巨大差异。在韩伟《海内外唐代黄金器萃编》中,所讨论的重心,是对金银器形制、纹理、制法的剖析及对唐代黄金器历史的分期。首次对装饰图案题材进行了综合整理,对动物纹样逐一说明,将花卉纹样分六种。接着对纹样图案的结构划分,认为唐代金银器装饰构图中有点装与满地装,而各自又有几种结构形态。纹样的颜色变化以及在内容上的类别,均具有时代特征。这种详尽的比较对于探讨各类相关问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是该书中主要研究成果。在对唐代金银器形制、纹理、制造技术等分类、研究基础上,编者还将该书中收集的各类器物作出了分期。为本研究中分析唐代金银酒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第二种是以名物考古的角度进行研究。由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所编撰的《中国艺术史图典·金银卷》是目前唐代金银器研究的代表著作,在《中国艺术史图典·金银卷》这书中,以时代为序着重分析了其用途与功能,为进一步认识唐代金银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该书对出土的各件器物,从形制、纹样、大小、工艺、铭文等各方面做出了详细记载,并列出了大量照片资料。

第三种是以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赵瑞廷在2006年出版的《唐代金银器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承接》一文着重剖析了受异国文化交流的影响,唐代金银器技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我国传统技艺的特色。从唐代金银器的工序方法、器形与纹理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对我国传统金属材料工艺技术的继承。与此相同的,尚有刘思的《粟特文化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郭范琳《唐代金银器中的粟特文化元素分析》等文章,分别从外部因素的角度,探讨了唐代金银器的造型、工艺技术的革新、图案和纹饰等问题。综上已知金银器设计在唐代到达了鼎盛,并反映出唐代少数民族设计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总体审美特征。

## （二）与唐代丝路贸易相关文献

本研究所针对的唐代贸易的发展状况研究主要从丝绸之路方面进行探讨。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发展历来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文献比较丰富。

从历史文献方面来看，主要有王茹芹编著的《中国商路文化》一书，该书主要以我国商路的历史发展过程、构成要素特点、历史贡献以及当代价值为主体内容，介绍中国商路的基本特点，并通过历史沿革、商业贩运，以及沿途村镇、沿线商业、社会历史及其影响等五个方面描述了各条商路的基本面貌，显示中国商路历史发展轨迹。以时代为序介绍了各条商路的崛起、繁荣、衰败历程，着重介绍了唐代的陆上丝路、水上丝路的繁盛情况，并阐述了中国商路盛衰与政权更替、历史战乱、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联。与此不同的是，英国作者吴芳思女士的《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 of Asia》“丝绸之路”话题，现在也一直是东西方学界的共同话题，而每位研究者在书写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时，其实都有各自的出发点，也因为如此才能够尽己所长。是从英国人的视角来写丝绸之路，着重是在介绍从河西走廊到布哈拉绿洲中间近二千年丝路的发展史，这一地理区域也是对丝路文化在交流文明、沟通物产等领域方面影响较大的地方，也同样是对当时探险家、考古学者、欧洲殖民主义者所观察、记载最为丰富的地方。吴芳思运用了东西方历史资料和考古文物材料，从中国先秦时代的白玉与丝绸，开始逐步介绍到了20世纪30年代穿行于丝路上的人类生活，给读者勾画了一种十分完整的宏观历史画面。梁二平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张剑光的《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都从海上丝路为切入口，详细介绍了唐代海上商业航路的兴衰以及城市港口的繁荣发展等，二者最不同的地方是在梁二平的书中，通过对打捞起来的古代船只、出水器物、文书以及遗存文物等的研究与调查，剖析了唐代海上商业丝路及其沿途地域的市场布局情况并研究了其交易的特点、形式、影响范围，通过观察唐朝前后期南方区域市场布局的变化深入研究了其成因、变化的规律以及影响机制等，对唐代南方商业布局的变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从文献方面来看，研究者多数是以唐代和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贸易状况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温翠芳在《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中通过古籍文献、出土文物等论述了唐代盛行酒家胡（胡姬）是因为唐代繁荣的商贸吸引外商而在唐王朝常驻，在城市中经营酒业的多为胡人，如波斯人和粟特人等，同时酒馆也是唐朝诗人钟意的去处。孟彭兴写的《唐代发达的内外贸易与唐人社会生活风貌的嬗变》和韩森撰写的《唐代金银器-万里丝路与何家村窖藏》亦是通过对唐代丝路贸易的角度来阐述唐朝社会风貌。

在众多文献中难得一见的一篇研究唐代工艺品与贸易关系的文章是王怡苹《唐朝海上交通与贸易\_以长沙窑贸易瓷为线索的考察》，要以唐朝时期“黑石号”古沉船为研究点，它通过沉船中发掘出的瓷器形制、纹样、颜色、制作工艺论证唐朝时的国力强盛与海洋外贸的开启、所航行的路线与航海据点，在湖南的长沙窑为西方国家“特殊订制专用烧造”的国际贸易现象，在中国唐朝的北南窑口中也是独有的。

交易瓷制造和营销中有全面的展示，展现了海上丝绸的发展盛况。纵观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唐代金银酒器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但是，尚存一定的研究空间，如需进步完善，具体表现在没有系统论述唐代金银酒器中丝路贸易的价值。

### 三、研究方法

以实物的出土情况为主要根据，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首先依照分类学的方式将出土的唐代金银酒具进行了分类整理，而后再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将不同特点比较研究，并大量地查阅历史文献剖析唐代金银酒具形制特点、纹样的装饰特征、审美特点和文化内容上的各种差异，为不同的形式与丝路贸易之间的联系寻找答案特点。

论文中将应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类法”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唐代丝路贸易往来

### 一、唐代丝路贸易概况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进步，基本上都是源于贸易的兴起。古希腊文明的开端，来源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导致的海外商贸与工业的繁荣。古印度文明的兴盛，也是由于同古代阿拉伯地区繁忙的贸易往来而使然。丝路的出现，为后来大唐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一批由商而兴的世界级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当时我国富裕和强大的主要标志，也使我国文明发展成为令人艳羡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不但是贸易之道，而且还是文明之道、创新之道，各国之间的文明都经由丝路贸易而流动传承，相互交叉融会贯通。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成立唐朝；此后相继铲除了中国北方地区以及南方地区的武装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唐朝盛世之门也从此打开。唐朝前期由纷乱进入大治，并形成了“贞观之治”的长期稳定发展局势。640年，唐朝军队攻克了高昌，随后于当地设安西都护府；之后经历了武周时代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财力积聚，直到开元初年，其管辖权力范围已涵盖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并一直渗透到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地区。原来在中亚的粟特人大批进入唐朝便是发生在这一时候。唐朝在此时步入了全盛发展阶段，经济繁盛，文明璀璨，国力强盛，声威远播，被誉为“开元盛世”。就在唐朝盛极之时，“安史之乱”导致了中央政权控制力和财力衰退，使唐朝政府不得不放弃西域的经营，虽然叛军最后还是被平定，但唐朝国民经济却开始由盛转衰。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内乱外患交困，地方藩镇割据，内宦专权，朋党纷乱，异族侵扰。国内各地的武装斗争终于给大唐王朝奏响了挽歌。907年，唐朝终被节度使朱温所灭，由此终结了近三百年的王朝。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也是国土最广的朝代之一，是我国多民族制度建设发展的关键阶段。在最鼎盛时期，统治权力所达之处东至大海、西至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至南海的广大领土，漠北、西域也在其中。控制的地区户口最多时达到九百余万户，总人口5200余万人，是当时全球上疆土最广大、人口庞大复杂的多种族帝国。唐王朝屹立于东亚大陆之时，正是波斯萨珊王朝正处于衰弱灭亡的阶段，拜占庭帝国实现复兴，法兰克逐渐掌控欧洲大半地区，阿拉伯人开始走上国际舞台，各个文明间的冲突与交流走向了一个崭新阶

段。

《新唐书·西域列传》中说：“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此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

<sup>[1]</sup>在西方商人心中，大唐王朝是一座蕴藏了无数财宝的地方。他们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地走向通往长安的丝绸之路。而由于人们永无止境猎奇冒险的本性和寻求巨额利润动机的驱使，在不断的实践和探寻过程中，西亚商人采用长距离跋涉和短距离中转运输结合的方式，从西方带来中土所需的香料、玻璃器具、铜镜、水晶制品和化妆品，然后再从西市购买丝绸、茶叶等，纵使经过戈壁沙漠，又增加了路途上的花费和损耗，进出之间依然利润可观，即使有一半的货物抵达目的地就是暴利。正是由于欧亚各方在大唐西市得到了丰厚的利益，才使得罗马和波斯、吐蕃与唐王朝为争霸丝路进行战争。

如《资治通鉴》中叙述丝路沿线盛况时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林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sup>[2]</sup>意思是说，丝路经过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及陇山以西天水、兰州犹如现在的北上广深等这些沿海城市，由于商旅的拉动兴旺发达，强有力的促进了唐朝的经贸。

丝路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一次向西艰难的行走，无异于用双脚突破了地域束缚，形成对世界其他文明的新理解。它最终建立了中国人一个开放的世界观和公平沟通的方式。“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sup>[3]</sup>，我国唐朝丝绸之路最终逐步形成了南丝绸之路与北丝绸之路，南北交相呼应的贸易态势（见图 1.1）。

[1]（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西域列传卷二百二十一下[M]. 上海：中华书局，1975.

[2]（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上海：中华书局，2011.

[3]（唐）蘅塘退士，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张籍. 凉州词三首[M]. 上海：中华书局，1984.



中道过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后—越葱岭—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安国（今中亚布哈拉）—波斯和西海东岸的安都城（今土耳其安塔基亚）。

南道经鄯善—于阗—喝槃陀（古称蒲犁，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葱岭—吐火罗（今阿富汗）—北波罗国（今巴基斯坦）和西海（阿拉伯海）。”

[1]

此时，罗马市场上的所有丝绸与黄金同价。许多经营丝绸生意的商人迅速暴富。丰厚的商业收益也吸引了更多商贾，在长安城，来自欧亚大陆以及东南亚等地的商人随处可见，陆上丝路沿线生意异常兴隆。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长安的商贾日益富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北丝路的商品种类也随之增加，其它产业也因此蓬勃发展。北丝路上的货物琳琅满目，奇珍异宝令人目不暇接，从牲畜到野兽，从各类动物皮毛、花卉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藏、金属、器具、武器、各国书籍、乐器等，几乎应有尽有。长安东市的商家品类高达 220 行，有金银行、铁行、肉行、书行、绢行、秤行、笔行等。旅馆和餐馆这类服务行业也很兴盛。据记载，在长安东市燃起的一场大火导致曹门以西十二行被焚毁的店铺就有四千余家，损失的金银、丝绸等商品等数以亿计。北丝路上的频繁往来，使得长安由上至下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西域的舞蹈、音乐、绘画、服饰、饮食，都成为唐人最喜欢的事物；从西域而来翩翩起舞旋转如飞的胡姬所开的酒店，亦成为当时文人雅士们常去的地方。不仅仅是长安，还有许多从事贸易的城市和港口也发展迅速，逐渐形成外贸集散地和商贸重镇。高额的关税收入使大唐国库充盈、国力强劲，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随着北丝路的不断延伸和贯通，唐朝为其商业交流制定了大量政策，由此观唐朝十分重视北丝路，并在发展官方贸易的同时，大力发展民间贸易。北丝路上的贸易形式，大致有互市贸易、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三大部分。

互市贸易的建立，进一步推进了内地与西域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朝贡贸易的实质意义是以物易物并且带有浓厚国家之间的政治色彩。唐玄宗统治期间朝贡的国家和地区达“七十余蕃”，其中包括焉耆、突厥、于阗、契丹、疏勒、吐蕃、龟兹等周边不同民族聚集区，还有日本、大食、波斯、罗马等西方诸国。朝贡主要贡品有珍禽异兽如狮子、豹子、大象、鹦鹉等；各类珠宝珍玩水晶、金银、珍

[1] 王茹芹. 中国商路文化[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10.

珠、玳瑁等；珍贵的香料药材以及棉织品，甚至还有乐伎、舞伎等。朝贡贸易满足了各国贵族的需求，增进了大唐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和贸易往来。丝路沿线城市的精明商人抓住商机跟随域外各国使节一路来到长安，并以此促进沿线城市商业繁荣。西域的商人们运来马匹、皮毛、金银器、珠宝、玻璃器皿等特产，在长安进行售卖，再贩卖丝绸到西域和中亚、欧洲等地区，由此推进了丝路上的民间贸易往来；民间贸易是商品运往西域和中亚、西亚、欧洲的一种重要贸易方式。随着丝路贸易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胡商前往大唐经商。在长安和其他商贸重镇设立贸易交流的据点，甚至有了自己的居所。《唐六典》中记载，大唐与世界各地三百多个国家、地区有过往来，长安和洛阳一带，有不下十万胡人定居于此。

### 三、南丝绸之路

唐中期以后，由于两个方面因素导致北丝路贸易开始衰落，经济重心南移。

一是战乱的影响。唐朝中期战乱频繁，丝路贸易被阻碍。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稳定性便被打破，其所庇佑的北方经济也受到冲击。西藏吐蕃人越过昆仑山，向北方进军，对西域的大部地区进行侵略，商人为求保护自身安全而不愿远行，北丝路日渐衰败。经济活动逐渐向南发展，变成以南方为主的经济贸易结构。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向南迁移，其中就包括胡商和大批的制作金银器的工匠。南迁移民不只是局限在淮南和江北等地区，而且主要往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迁移，这使南部人口持续发展，偏远地区人口也得到相应的充实。不但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提供北方先进的科技和产业技术，给南方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强劲力量，进而极大促进南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是海上贸易的发展。以谋求利润为主的商人开始逐步放弃北丝路商业通道。这不但迫使北丝路上的一些城市贸易迅速衰败，战略地位彻底丧失，同时也促成了海上丝路的兴盛。

在北丝路和南丝路两个方向丝绸之路中，南丝绸之路又分为海陆两种不同运输方式。

#### （一）以西南、东南为主的路上丝路

自唐中期开始，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治格局出现了变化。南诏从唐独立为南诏国，其西邻东天竺，西南邻近骠国，西北与吐蕃相接，南边挨着兰那泰、

南掌、安南，交通运输便捷。滇缅印道交通便利水陆相接，伊洛瓦底江连接陆路，可入骠国，出孟加拉海湾，北进长安。和南诏国相连的东天竺，西临印度大陆，南挨孟加拉海湾，可以通过恒河到中天竺，是印度与大唐贸易重要的陆上中转站，同时也是印度与吐蕃进行贸易的重要地点。围绕滇缅印道形成一个陆海接壤的贸易通道，迎来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相互交融的盛世。由此形成了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的三条贸易通道：“其一，长安通往阿萨姆：长安—剑南道—羊苴咩城—保山—腾充城—弥城（今盏西）—保山城（今昔马）—金宝城（今缅甸密支那）、丽水城（今达罗基）—安西城—渡亲诺江—越那家山脉—入阿萨姆；

其二，长安通往缅甸：长安—剑南道—羊苴咩城—保山市—诸葛亮城（龙陵）—一些乐城（瑞丽）—入骠国；

其三，长安通往西双版纳通中南半岛海边居民地：长安—剑南道—羊苴咩城—濮败（大理南涧）—银生城—开南城（景东又景）—利润城（勐腊易武）—柳追和城（镇沅思乐）—羌浪川（越南莱州）—大银孔（思茅市、西双版纳、泰国景迈以及老挝北部）。”<sup>[1]</sup>

南诏国境内城镇交通四通八达，物产丰富。从吐蕃印缅等东南亚地区主要输入的商品主要有毡、缯布、真珠、海贝、瑟瑟、琥珀、金银、各类珠宝、牛羊、香料等，《蛮书》卷六云：“银生城在扑爰之南，……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sup>[2]</sup>在唐代南诏国时期，不仅南方丝绸之路的滇缅印通道仍是与南诏国骠国东天竺吐蕃四国交易的主要途径，同时南诏国还利用银生节度地区，开辟了羊苴咩城南边中南半岛的贸易集市。

在唐朝关于南诏国的交易中并无关于蜀商的记录，说明当时蜀商已经淡出了南方丝绸之路境外商贸市场。究其原因，应是蜀地商人东循长江南下，江南有更广阔的市场。中唐以后，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再加上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本身自然条件优越，紧挨海边，海上外来贸易船只众多，这些外商的足印踏遍唐朝南方各地，从沿海沿江交通便捷发达的城市和港口再往东南腹地深入，最后到达长安、洛阳等内陆城市。例如扬州，主要来往的外国商人是大食、萨珊波斯，而来广州的则大多为东南亚地区以及阿拉伯、萨珊波斯、大食、狮子国、室利佛逝、诃陵

[1] 屈小玲.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古国文明与文明传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 樊绰. 蛮书[M]. 北京: 中国书店, 2007.

等国家的商贾；明州是江南地区与日本以及新罗等国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和人才交流中最主要的口岸；台州、温州则是日本、新罗和天竺等国商船最为聚集的口岸之一。从口岸城市进入，一路往内陆经过苏州、金陵、益州等发达城市最终到达长安和洛阳，扬州和益州是我国唐朝著名商贸城市有“扬一益二”的美称。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对扬州、益州作出了对比：“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益州）半。”<sup>[1]</sup>益州是和东南地区最富庶的商业都市扬州齐名的城市，也是唐朝内地商贸重地，和长江沿岸沿江内地城市贸易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这片区域形成了独特的海陆丝路贸易相互交融的景象，多重因素和条件让东南地区形成了繁荣的贸易往来。

东南地区出现的大量外商对这里的城市经济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是推动唐朝东南地区国外经贸的蓬勃发展和国内外贸易的互动，随着大量西方高档奢侈品的来到，外国商人获取暴利，因此唐朝大批商家关注国外贸易并前往国外谋求利润。二是促进唐朝东南部地区商贾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利益可观的商品。三是西方各地的外商到来推动了东南地区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如各类书籍、艺术、宗教等等随着贸易深入唐朝进行传播。四是外商对东南地区的饮食风俗和生活习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不同的饮酒习惯与酿酒技术、酿酒的材料以及盛酒的器皿。外商在东南地区的投资经营主要以金银珠宝业最为常见，经营这类店铺的多为大食和波斯等国的胡商，除金银珠宝以外在越州、润州、宣州等地活动的胡商还运营其他的商品，比如大食商人运来的蔷薇水、龙脑油、金银器具等各类奢侈品。

## （二）海上丝路

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航海技术的提升和北丝路的凋零，北丝路逐渐被海上丝路所取代并日益显现出它的优越性，在中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区，大多集中于东南一带，如果再通过陆路辗转到北丝路运输，转运繁复，时效性减弱且劳民伤财；反之，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成熟，我国东南地区海岸不冻港数量众多优势显著，运费便宜。中唐以后由于大食定都于巴格

[1]董诰（唐）.全唐文.卷 0744 卢求.成都记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达,所以巴格达取代波斯成为中西交易中最大的中转站,大食也迫切需要与大唐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换与来往。并且大唐东边日本的遣隋使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都展开了频繁交流,因此东至日本、西到大食都已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稳定的航道沿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波斯湾和东非的航线:“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这条航路在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同时还记载了这条线路上途径的国家环王国(占城,越南中南部)、门毒(越南归仁)、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佛逝国(印尼苏门达腊东南部)、狮子国(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南部),波斯未罗(巴士拉)等。”<sup>[1]</sup>

唐是一个勃兴的时期,背后的推动力之一就是海上丝路贸易带来的巨大收入与贵金属交易,在海上贸易中,许多国家如阿拉伯、波斯与东罗马帝国等都采用金币或银币支付或直接使用金银为货币。这些金银随着货物商品源源不断地抵达泉州、广州、扬州等港口,进而使得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率先开展尝试运用银本位币计值。根据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所说,真腊、三佛齐、细兰等国,番商兴贩都用金、银、瓷器等交易。

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贩运的商品种类更加繁多,从唐朝输出的商品均是大宗货物如丝绸、瓷器、茶叶等;从海外输入大唐的商品主要有香料及各种自然资源。金属资源包括来自于日本的砂金、银、铜的进口。还有产于东南亚的锡、铅也是大唐从海路进口的重要商品。除此以外,我国还从海上输入了大宗货物例如粮食和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大象、金钱豹等。

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是唐代金银酒器发展的深厚背景条件,同时提供了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双重保障。在农业上,国家实现大一统,政治环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耕地面积稳步扩张,从西方传来提升葡萄种植的技巧以及酿酒的技术促使葡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同时提高了葡萄酒的产量;在手工业方面,随着丝绸之路西方工艺技术传入唐朝,推动唐朝手工业技术的提升;在商业上,由于丝路的畅通,唐朝私营、市场经济开始萌芽。横贯东西的丝路贸易并不是由某个国家或单个民族单独进行的,而是在丝路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丝路沿途的国家和民族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大规模、长途的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中,他们不断地

[1] 王茹芹. 中国商路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和文化。

## 第二章 唐代出土金银酒器与丝路贸易的简况

古代中国社会非常重视酒器，“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酒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民俗习惯、礼仪制度、文化观念等方面，应该说它是“为器虽小，而在礼实大”。上到社稷祭祀，下至平日宴饮，酒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金银制作而成的酒器一直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银酒器的制作工艺、形制，纹样都自然而然会出现一定的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见证。金银酒器发展至唐朝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

商周时期流行青铜器。主要是用于祭祀的礼器，如鼎、爵、簋等。在殷商时期，金银酒器较少，制作工艺较为简单，装饰也较少；秦朝时期金银酒器尚未没有发现，而酒器主要以漆器为主；西汉以多金王朝著称，金银制品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品类也在增多，工艺更加完善，酒器多为简洁大方的素面造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最频繁的时候，此时佛教被广泛传播，金银器主要也是佛教用品为主，金银酒器较少。隋时期则基本上以各类瓷制酒器为主，金银酒器为辅，唐代则是我国金银酒器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富足的社会环境和灿烂的文化促进了金银酒器的发展，金银酒器争妍斗丽的诞生且愈加趋于精致，主要器型有金杯、金碗、金铛、金盏、银杯、银碗、银铛、银盘、银盏、银执壶、金银双鱼榼、注子等。

千百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不同历史阶段的酒器的产品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唐朝酒器的材料、形制、纹样直接体现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思想动态、科技技术发展水平和艺术风格，展现出这个时代传统文化的发展全貌，故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璀璨瑰丽的各式酒器，它们凝聚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表现出了卓越的创造性和技术水平。

唐代金属酒器多出土于窖藏和墓葬中，至目前为止，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河南省偃师李景由墓、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唐齐国太夫人墓、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陕西省蓝田杨家沟、江苏省丹徒丁卯桥、浙江省长兴下莘桥、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浙江省临安水邱墓、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西安市东郊韩森寨、浙江省淳安县朱塔、山西省繁峙县、西安市东郊西北国棉五厂65号墓、宁夏省固原、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唐代韦洵墓、西安市鱼化寨南二

府庄等地皆有出土，目前全国已发掘的唐代金属酒器种类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两处为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县丁卯桥窖藏。通过现有资料可知，唐代金银酒器一般是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展现在大众视野当中，所以本章节以考古发掘报告中的数据为研究的基础，梳理唐代金银酒器国内的出土情况以及国外的收藏情况，将唐代金银酒器发展的基本特征以表格化的方式展示出来，也为后续章节的论述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表 2.1 唐代金银酒器出土简况（国内）

序号	出土年代	出土地区	遗迹类型	金银酒器数量	参考文献
1	1957 年	陕西西安市和平门外	窖藏	鸿雁纹宣徽酒坊银碗 鸿雁折枝纹四曲银碗 素面五曲高足银杯	马得志《唐代长安城平康坊出土的婆金茶托》，《考古》1959 年年 12 期。
2	1958 年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	窖藏	背阴村素面银高足杯 背阴村双鱼纹银长杯 “宣徽酒坊”莲瓣纹弧腹银碗 背阴村折枝纹多曲银碗	刘向群、朱捷元《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金银器》，《文物》1966 年 1 期。
3	1963 年	陕西西安东南郊沙坡村	窖藏	沙坡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 沙坡村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 沙坡村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 沙坡村折枝纹弧腹银高足杯 沙坡村素面筒形银带把杯 沙坡村折腹银碗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 年 6 期。
4	1965 年	西安市南郊白庙村出土	窖藏	金杯坯	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展厅
5	1968 年	西安城建局送交	窖藏	鸿雁纹海棠形银杯 双鱼纹荷叶形银杯	保全《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 年 1 期。
6	1969 年	咸阳西北医疗器械厂	窖藏	鸳鸯蔓草纹金壶	李毓芳《咸阳市出土一件唐代金壶》，《考古与文物》1982 年 1 期
7	1970 年	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	窖藏	何家村素面筒腹银高足杯 何家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 何家村人物纹金带把杯 何家村乐伎纹银带把杯 何家村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 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 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 何家村银耳杯 何家村折腹银碗(高 7.8, 宽 19.2)	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 年 1 期； 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 年 7 期； 一冰《唐代冶银术初探》《文物》，1972 年 6 期。

续表 2.1 唐代金银酒器出土简况（国内）

序号	出土年代	出土地区	遗迹类型	金银酒器数量	参考文献
				何家村折腹银碗（高 7，宽 17） 何家村莲瓣纹弧腹金碗何家村云 瓣纹弧腹银碗何家村摩羯纹弧腹 银碗何家村龙凤纹弧腹银碗 何家村折枝纹带盖银碗何家村团 花纹带盖银碗何家村云瓣纹圆底 银碗 何家村折枝纹圆底银碗 何家村舞马纹提梁银壶何家村莲 瓣纹提梁银壶何家村素面提梁银 壶 何家村素面提梁银壶 何家村鹦鹉纹提梁银壶 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壶 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壶 何家村双狮纹短柄三足金铛 何家村素面短柄三足银铛 何家村素面长柄三足银铛	
8	1972 年	西安建国路	窖藏	鸿雁蝴蝶纹银碗 鹦鹉纹海棠形银碗	保全《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 几件唐代银器》，《考古与 文物》1982 年 1 期。
9	1975 年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	窖藏	双鲤宝相莲瓣纹银碗 双鸿小簇花银碗 鸳鸯鸿雁折枝花银碗 石榴折枝花银碗 西北工大石榴纹圆底银碗 西北工大鸿雁纹弧腹银碗 西北工大鸿雁纹多曲银碗	保全《西安出土唐代李勉奉 进银器》，《考古与文物》 1984 年 4 期。
10	1975 年	浙江长兴县下莘桥	窖藏	五曲莲瓣圈足银杯 五曲莲瓣平底银杯两件 素面圆口银碗 八曲鎏金银羽觞	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一 批唐代银器》，《文物》1982 年 11 期。
11	1975 年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	墓葬	狻猊纹银盘胡人头执壶 素面椭圆银杯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 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 古》1978 年 2 期；夏鼐《近 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 《考古》1978 年 2 期。
12	1976 年	辽宁昭盟喀喇沁旗	窖藏	喀喇沁双鱼罐形银壶	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 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 器》，《考古》1977 年 5 期。
13	1977 年	陕西西安市东郊枣园村	窖藏	六瓣素面银碗	保全《西安东郊出土唐代 金银器》，《考古与文物》 1984 年 4 期。

续表 2.1 唐代金银酒器出土简况（国内）

序号	出土年代	出土地区	遗迹类型	金银酒器数量	参考文献
14	1979年	西安西郊鱼化寨南二府	窖藏	宣徽酒坊银酒注	朱捷元等《西安西郊出土“宣徽酒坊”银酒注》，《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15	1979年	浙江淳安县朱塔	窖藏	淳安素面银高足杯	浙江博物馆：《浙江淳安县朱塔发现唐代窖藏银器》，《考古》1984年11期。
16	1980年	陕西蓝田县杨家沟	窖藏	折枝团花纹银碗盖 五瓣素面银碗 蓝田绶带纹圈底银碗	樊维岳《陕西蓝田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17	1980年	浙江临安县水邱氏墓	墓葬	“水邱氏”素面银注壶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81年。
18	1982年	江苏丹徒县丁卯桥	窖藏	龟负“论语玉烛”酒银筹筒 银鎏金论语酒筹令 酒旗 酒熏 丁卯桥鸚鵡纹多曲银碗 丁卯桥素面多曲高足杯 丁卯桥素面罐形银壶（瓮） 丁卯桥素面银注壶（高22，口径8.4） 丁卯桥素面银注壶（高19，口径6.6） 丁卯桥摩鵝纹银盆（酒罇）3件	丹徒县文教局等《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11期；陆九皋、刘建国《论语玉烛考略》，《文物》1982年11期。
19	1982年	陕西西安市韩森寨电车二场	窖藏	韩森寨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 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 韩森寨缠枝纹银带把杯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20	1983年	宁夏固原		鎏金胡人头执壶	
21	1983年	西安市太乙路	窖藏	摩羯纹金杯	贺林等《西安发现唐代金杯》，《文物》1983年9期。
22	1984年	河北宽城大野峪村	窖藏	素面银执壶	宽城文管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考古》1985年9期
23	1984年	河南洛阳宜阳县		桃花形结八瓣银高足杯	河南博物院
24	1984年	河南偃师县杏园李景由墓	墓葬	银鸚鵡杓 李景由素面圈底银碗 李景由短柄圈底银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5期。
25	1985年	陕西临潼唐庆山寺	塔基地宫	临潼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	《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5期。

续表 2.1 唐代金银酒器出土简况（国内）

序号	出土年代	出土地区	遗迹类型 遗址	金银酒器数量	参考文献
26	1985 年	青海都兰县	墓葬	银鎏金狮纹杯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 年 4 期。
27	1988 年	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韦洵墓	墓葬	“韦洵”鸿雁折枝纹银杯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文物选萃》，重庆出版社，1998 年。
28	1989 年	陕西西安市东郊西北国棉五厂 65 号墓	墓葬	花鸟纹鎏金三足银罇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文物选萃》，重庆出版社，1998 年。
29	1990 年	山西繁峙县	窖藏	繁峙多曲银碗 繁峙折枝纹提梁银壶	李有成；《繁峙县发现唐代窖藏银 31 器》，《文物季刊》1996 年 1 期。
30	1991 年	河南伊川县鸦岭齐国太夫人墓	墓葬	伊川缠枝纹弧腹银高足杯 双鱼纹海棠花形金盏 2 件 齐国太夫人双鱼纹金长杯 齐国太夫人绶带纹弧腹银碗 齐国太夫人提梁银壶 双凤衔绶纹银扁壶 齐国太夫人长柄圆底带盖银铛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 年 11 期。
31	2004 年	福建厦门陈元通夫人汪氏墓	墓葬	鎏金摩羯纹多曲银碗	
32		陕西咸阳		咸阳缠枝纹金注壶	
33		西安文管会		西安摩羯纹金长杯 西安鸿雁纹银长杯 西安鹦鹉纹银长杯 西安折枝纹弧腹银碗 西安蝴蝶纹平底银碗	
34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	

资料来源：唐代金银酒器出土简况（国内）作者自作

表 2.2 国外唐代金银酒器收藏简况

序号	地点	金银酒器
1	日本白鹤美术馆	瑞鸟萱草纹八曲银长杯狩猎纹六瓣脚杯 珍禽异兽联珠脚杯 白鹤联珠纹折腹银高足杯 白鹤狩猎纹弧腹银高足杯 白鹤缠枝纹弧腹银高足杯 白鹤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 白鹤缠枝纹银带把杯 白鹤缠枝纹银长杯 白鹤鸚鸡纹银长杯 白鹤飞禽纹银长杯 白鹤莲瓣纹弧腹银碗
2	弗利尔美术馆	弗利尔葡萄纹银带把杯 弗利尔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 弗利尔缠枝纹弧腹银高足杯 弗利尔高足银长杯 弗利尔莲瓣纹弧腹银碗
3	纽约	纽约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 纽约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 纽约莲瓣纹弧腹银碗 纽约缠枝纹弧腹银碗
4	卡尔·凯波	凯波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 凯波葡萄纹筒腹银高足杯 凯波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 凯波立鸟纹折腹银高足杯 凯波折枝纹弧腹银高足杯 凯波督草纹弧腹银高足杯 凯波缠枝纹银带把杯 凯波折枝纹银长杯 凯波高足银长杯 凯波莲花纹罐形银壶
5	大和文化馆	大和文华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 大和文华缠枝纹银带把杯 大和文华折枝纹弧腹银碗
6	藤井有邻馆	藤井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
7	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阪缠枝纹银带把杯
8	芝加哥美术研究院	芝加哥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 芝加哥葡萄纹弧腹银高足杯 芝加哥带托银长杯 芝加哥缠枝纹弧腹银碗
9	耶鲁美术学院	耶鲁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
10	圣·路易斯美术馆	圣·路易斯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

续表 2.2 国外唐代金银酒器收藏简况

序号	地点	金银酒器
11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纳尔逊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 纳尔逊缠枝纹银带把杯
12	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缠枝纹银带把杯 大都会高足银长杯 大都会莲瓣纹弧腹银碗 大都会卧鹿纹弧腹银碗
13	霍姆斯	霍姆斯凤鸟纹银带把杯
14	维多利亚博物馆	维多利亚缠枝纹银带把杯
15	詹姆斯·盖·索	詹姆斯鸟纹银带把杯
16	西雅图美术馆	西雅图缠枝纹银带把杯 西雅图折枝石榴纹多曲银碗 西雅图折枝串花纹多曲银碗
17	旧金山艺术博物馆	旧金山缠枝纹银长杯
18	不列颠博物馆	不列颠银长杯
19	明尼亚波利斯艺术研究院	明尼亚波利斯折腹银碗
20	瑞典	瑞典折腹银碗

资料来源：国外唐代金银酒器收藏简况作者自作

## 一、北方出土金银酒器设计与丝路贸易

通过如表 2.1 所示的数据可知：

就目前出土报告中显示的唐代金银酒器的发掘状况来看，分为窖藏和墓葬两种出土形式，其中又以窖藏出土的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以西安为主的北方地区，其次是以江苏浙江为主的南方地区。这与长安和洛阳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以及丝绸之路的起终点有直接关系，而南方地区出土唐代金银酒器较多的原因则与唐中后期战火导致的北方丝路阻断和经济重心南移有关。此外，还和金银的产地以及南方丝路的逐渐兴盛有关。



图 2.1 唐长安城复原布局图

(图片来源《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53 页)

例如从何家村窖藏中发现的金银酒器总量庞大、品种繁多、工艺精湛、品质上乘，是最能代表北方金银酒器的窖藏。1970 年 10 月 5 日，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偶然找到一处唐代窖藏，这是在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窖藏之一，珍宝的意外重现于世向我们诉说千年前的大唐盛世。窖藏中出土两只陶瓮和一个提梁银罐，里面储存着精美器物一千多件，其中尤以三十余件金银酒器最为突出。这些金银酒器纹饰样式丰富，凸显唐代多文化融合的时代特色；加工工艺高超，代表了唐代金银酒器制作的最高水准，无论是从丝路贸易层面、艺术文化层面，还是工艺技术层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经考古资料记载西安市南郊碑林区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物在长安皇城周围兴化坊内。公元 618 年唐朝建立之时，长安城地域空间以朱雀街为线东西划分，街东面为高官显贵、王公贵族居住的核心地段，街西面是平民聚集的地方以及集市。而何家村金银器出土地在朱雀门街西面第二列第三坊正是兴化坊，东距国内商品交易集市东市大约三公里，西边距舶来品交易集市西市大约一公里，北面则紧邻皇城（见图 2.1）。西市内还寓居着大量来自中亚撒马尔罕的商贾。当时繁荣的西市不仅聚居着大批富有的丝路商贾及其家属，更是吸引进入了大量制作金银器的匠人，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金银器的

制作工艺。

何家村金银酒器根据纹饰设计的发展规律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初唐到武则天时期，代表器物为舞伎八棱金杯、蔓草龙凤纹银碗、狩猎纹高足杯、海兽纹十四云瓣银碗、乐伎八棱金杯、双狮纹九瓣单柄金铛、双狮纹十云瓣银碗等器物，从器形设计到装饰纹样设计均显示出强烈的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在少许金银器中，已产生下一期装饰图案纹样设计的初形——团花纹样，如蔓草鸳鸯纹银羽觞、掐丝团花金杯等；第二期，在玄宗至德宗时期，不论是金银酒器的器形设计还是纹样设计，外来文化的影响均已明显下降甚至消逝，金银酒器的设计制造逐渐中国化。这一时期的图案设计以多子多福、莲花纹、如意吉祥的石榴纹为代表。这种世俗化充满吉祥寓意的纹样设计在第一期器物中很少看到。代表器物有金花鹦鹉纹提梁壶，以缠枝纹围绕羽枝、团花为图样。鹦鹉纹样总体造型写实，展翅欲飞。花鸟融洽的集中在同一整体视觉画面上。

唐代北方金银酒器发展演变的特征能够进一步说明长安作为国际化的大城市和交通网络的中心，来自西方的金银酒器源源不断进入唐朝。在社会由上到下的观念和技术革新的推动下，整个唐朝，尤其是金银酒器的制造风气十分盛行。在思想上，一是受秦汉道教的长生之术的深远影响，尤其重视金银。道家推崇“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由于统治者格外追崇，上行下效，逐渐形成风气。李德裕还曾劝告敬宗皇帝：“臣又闻前朝历代君王，虽嗜好方土，但未曾真服药者，因此《汉书》中称用黄金做成饮食器皿可以延年益寿。又高宗朝刘道合，玄宗朝孙甑生，饮食器都成黄金，却不敢服。”<sup>[1]</sup>二是，唐朝李氏皇族皆有少数民族血统，皇亲贵族喜爱胡人、西方的金银器设计风格，外来文化备受推崇，饮酒之风比前朝更胜一筹。金银酒器设计在异域文化的影响下，给唐代人们的设计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 二、南方出土金银酒器设计与丝路贸易

与何家村窖藏形成对比的是 1982 年元旦江苏省镇江市丁卯桥发现一处唐代银器窖藏，在深约 1.3 米处出土银做酒瓮一口，瓮内装有各类银器。该窖藏出土银器共计 950 余件，其中有银酒瓮、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筹筒、鎏金酒令筹、银碗、银碟、银高足杯、银盆、鎏金鹦鹉衔枝纹五曲银碗等酒具。丁卯桥在

[1] 刘昫. 旧唐书: 李裕德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唐代属于润州丹徒县，润州辖区范围有丹徒、丹阳、金坛、上元、句容六县，此地是我国历代军事要地，也是唐王朝的经济命脉，漕运的咽喉地带。因此丹徒县是交通、运输和商业发达之地，也是金银器设计制造中心之一，这里设有地方官府的金银作坊和大量的私营金银作坊。中晚唐时期唐朝中央官府和皇室的金银器皿多数来自于南方地区，目前考古研究发现带刻铭的南方进奉金银酒器，位置十分明确，有江南东道的越州、西道的洪州、宣州等地，证明南方的确存在着金银制造作坊和数量众多的工匠。何家村金银酒器多为初唐时期的作品，而丁卯桥出土的金银酒器设计制作时代在中唐末期，两者在纹样设计风格上有所不同。丁卯桥金银酒器的纹饰设计，品种繁多，时代特征十分显著。它们的主要特征是：纹样以缠枝花鸟居多，与何家村出土金银器不同，丁卯桥金银器纹样团花极少，不见绶带纹。缠枝纹回旋线条流畅细腻，鸟的造型设计形象生动，花鸟间相互呼应，结构疏密有致。与晚唐时期花鸟纹的设计逐步简化及呆板构成强烈对比。在另一件高银杯腰间饰以一圈凸出的棱条，这类萨珊装饰设计的遗风在晚唐银器设计中早已绝迹，团花纹样少见并且没有发现绶带纹。很明显它们在时间上应当早于以团花纹样和绶带纹为主的晚唐时期，但其纹样设计特征强烈地显示出由盛唐开始，向晚唐转变、承先启后的时代特征。同属于中唐末期尘封于地下的浙江长兴县下莘桥窖藏出土了银杯三件、羽觞一件，除羽觞纹样设计有几何纹花边和双龙鱼戏珠纹略显华美与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银器设计风格一致外，其它银酒杯设计皆是素面，无装饰且制作简单。这和产量大，器物精致的丹徒丁卯桥官府金银作坊的设计相比较，长辛桥器物稍显粗糙，以上各种现象都说明了这些酒器应是从私营金银作坊设计制作出的产物。由于南方地区基本未受到战争的波及，再加上经济重心南移刺激了南方地区金银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和当时进奉之风的流行，致使南方金银酒器设计为迎合唐人的审美加入大量本民族元素，设计制作的金银酒器样式新颖。

### 三、唐代金银酒器设计类型概述

结合如表 2.1 与表 2.2 所示的数据可知：

唐代经常使用的金银酒器设计类型是杯、碗、罇、壶、铛等，因此本节以全国出土的唐代金银酒器和文献以及国外收藏的藏品为据只分类论述盛酒器的设计、饮酒器的设计、温酒器的设计以及酒令用具的设计。

在敦煌文献《开蒙要训》中列举诸物名称，其中相连的一组器皿中多为筵席用器，即：罇、壶、碗、盏、卮、盘、罍、叠、杓、箸、匙。《安禄山事迹》卷上中也有记载玄宗在安禄山生日赏赐的酒器：“天宝十载正月一日，是禄山生日，先日赐诸器物衣服，玄宗赐金花大银盆二，金花银双丝平二，金镀银盖碗二，金平脱酒海一并盖，金平脱杓一，小马脑盘二，金平脱大盏四，次盏四，金平脱大（玛）脑盘一。”<sup>[1]</sup>在《太平广记》卷二二三中也有描写宴会时饮酒的场面“裴弘泰条云，唐裴均之镇襄州，某日举宴，其侄弘泰晚至，均之因此不悦，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寘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sup>[2]</sup>由文献和出土文物可知唐代金银酒器中盛酒器，多为罇、壶、瓶。罇也可以叫做樽，这是在筵席上对盛酒器的雅称。各个时期罇的造型设计各异，在唐朝筵席上盆的造型设计一般作为盛酒器物为罇，口径通常在三十厘米以上。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了银盆三件均是酒罇，两件银制素面罇，一件鎏金摩羯戏珠纹银盆口径34.5厘米，高7.3厘米（见图2.2）；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银金花摩羯戏珠纹四曲盆口径36厘米，高9.5厘米，以上两种都属于酒罇之列。前文中所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金花大银盆二”也属于这一种酒罇。而文中“金平脱杓”即是指舀酒的勺子。一般杓是放在酒罇中，再从酒罇等盛酒器或是温酒器中舀到酒杯中。一九八四年于河南省偃师市杏园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通长为29厘米的银鸬鹚杓（见图2.3）。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馆藏了两个类似于河南偃师遗址的银质杓，其顶端为鸬鹚。在台北故宫中藏有宋人临摹的《宫乐图》，图中的贵女就是使用这种长柄的酒杓。银酒杓的造型设计有独特的特点：勺腹呈八瓣状，每瓣都刻有缠枝纹。杓柄微微弯曲，并平鏤缠枝纹。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里王村唐墓，墓室东边墙壁的一张宴饮画中，食案前方矮床上置有一具六出花口的酒罇，罇中设弯柄酒杓，正是罇与杓的使用情景。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

[1]（唐）姚汝能. 安禄山事迹[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9.

[2]（宋）李昉. 太平广记: 卷二二三[M]. 上海: 中华书局, 2013. 3.

初醅醕。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sup>[1]</sup>



图 2.2 鎏金摩羯戏珠纹银盆



图 2.3 银鸕鷀杓

(图片来源：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

盛酒器同时兼具酌酒的器皿有壶和瓶，而唐朝时两者称呼可以互换又或者合称“壶瓶”。例如前文“金花银双丝平”中的“平”即指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记御赐禄山之物有“金花狮子瓶”；元稹有诗追忆翰苑旧事，句云“冰井分珍果，金瓶贮御醪”，是均出自禁中。<sup>[2]</sup>唐朝前期酌酒器的造型设计样式常用胡瓶和长颈瓶，如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带把壶和河北宽城银带把壶，这二件银壶是从粟特输入的胡瓶的造型设计，在唐代后期称其为注子也叫“注瓶”。<sup>[3]</sup>如西安市西郊鱼化寨南二府庄出土的“宣徽酒坊”铭刻咸通十三年银酒注（见图 2.4）；陕西咸阳也出土了一把缠枝纹金注壶，壶周身装饰有缠枝纹；在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一素面银注壶；江苏丁卯桥出土大小不同的素面银注壶各一。

[1]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李白.襄阳歌[M].上海:中华书局,1984.7.

[2] 扬之水.晚唐金银酒器的名称与样式[J].中国历史文物,2008,(06):14-24.

[3]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



图 2.4 “宣徽酒坊”银酒注



图 2.5 银鎏金双鱼榼

（图片来源：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经常出现在唐诗中的盛酒器——榼。榼是一种造型设计与瓶形式类似的酒器，榼以银制的为主，在白居易的诗中出现的频率最多，如在《夜招晦叔》：“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榼二三升。”<sup>[1]</sup>，“小花蛮榼”是白居易平时常用的一种形似花瓣的榼。在白居易诗中还记载了一种珍贵的银质双鱼榼，匠人将两条呈鱼跃状的鲤鱼嘴做成壶口，壶两边还有穿带子的穿孔，以便穿绳携带。在《寄两银榼与裴侍郎因题两绝》中说：“贫无好物堪为信，双榼虽轻意不轻。”<sup>[2]</sup>《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引》：“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sup>[3]</sup>，“金章未佩虽非贵，银榼常携亦不贫”《自永》<sup>[4]</sup>等等。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的银鎏金双鱼榼，是唐代众多酒榼基本造型设计的样式，在国内多地出土发现的唐代陶瓷所制作的双鱼榼，其造型设计灵感应该都是来自类似的样式（见图 2.5）。

[1]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白居易.夜招晦叔[M].上海:中华书局,1984.

[2]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白居易.寄两银榼与裴侍郎因题两绝[M].上海:中华书局,1984.

[3]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白居易.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引[M].上海:中华书局,1984.

[4]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白居易.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引[M].上海:中华书局,1984.



图 2.6 鎏金鸚鵡銜枝纹五曲银碗



图 2.7 宣徽酒坊银酒盏

(图片来源: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

唐代的饮酒器有杯、碗、卮、盏,后三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很严格。如果以早期文献中酒杯为准进行划分,比杯小的是盏,杯子带环柄属于卮,碗比盏大些许。酒碗的碗口的设计通常是四出花口、酒碗腹壁的设计呈微弧度,如西安沙坡村出土的折腹银碗、西北工大出土的鸿雁纹弧腹银碗、宾夕法尼亚折枝纹多曲银碗等等。而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银金花鸿雁纹四曲碗,“宣徽酒坊字字号”银金花鸿雁纹碗,则与上述碗的造型设计有所区别,其形态如王定保所著《唐摭言》第一五卷中记载唐文宗赐给王源中酒说到“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sup>[1]</sup>唐时金银酒碗的设计容酒量常量就在一升左右。

酒海是盛酒器同时也是饮酒器的一种,酒海在所有饮酒器中尺寸最大的一种。温庭筠《乾龔子·裴宏泰》说:“有银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饮。”<sup>[2]</sup>所谓银海就是银质酒海。白居易也在《就花枝》诗曰:“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sup>[3]</sup>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银金花小簇花纹盖碗高 11.7 厘米,口径 21 厘米、银金花折枝花纹盖碗高 11.9 厘米,口径 21.8 厘米,江苏镇江丁卯桥出土的鎏金鸚鵡銜枝纹五曲银碗高 10.5 厘米,口径 20.5 厘米等类似的酒碗应为酒海(见图 2.6)。

酒盏是将盏与盘合为一副的组合式设计,以形状和纹饰相统一的组合面目出

[1] (五代)王保定.唐摭言·第一五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4.

[2] 扬之水.晚唐金银酒器的名称与样式[J].中国历史文物,2008,(06):14-24.

[3]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白居易.就花枝[M].上海:中华书局,1984.7.

现。在河南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发掘的双鱼纹金盏银盘，就是以“盘盏一副”的设计形式出现的。类似的宣徽酒坊银酒盏出土于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见图 2.7）。

觥船又称为觥盏，也属于唐代饮酒器中容量很大的一种。但与酒海的设计不同，觥盏的设计样式并不固定，有长杯、多曲杯、船型杯等不同的造型。在《唐语林》中，记载了唐玄宗李隆基曾经“连饮三银船”的壮举，以此来显示帝王的霸气，杜牧的《醉后题僧院》：“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sup>[1]</sup>他通过豪饮“觥船”来表达自己的不羁和放松的心态。刘禹锡有诗题作《浙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句云“罚筹长竖纛，就觥盏如舫。”<sup>[2]</sup>觥船一般是在宴饮时劝酒和在行酒令时作为惩罚使用的，由此可见作为罚盏容量要大，不能轻易被饮尽才能在宴会时增添欢乐。江苏丁卯桥出土的银高足杯高 14.8 厘米，口径 14.5 厘米，此杯是酒器中与酒筹配套使用的觥盏，其造型设计之特殊，至今仍属孤例。西安太乙路出土的金摩羯纹四曲杯高 3.5 厘米，长 13.1 厘米，宽 7.5 厘米也属于觥船造型的一种。

羽觥是古代重要的饮酒器之一，形状为椭圆，平底，浅杯，杯体两侧有双耳，因此也称为“耳杯”。在唐代时使用的并不频繁，唐朝之后就基本消失了。陕西省西安何家村出土了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觥和一对鎏金鸳鸯纹银羽觥皆采用鎏金鏤花的方法设计制作成，花纹装饰设计自然、流畅、活泼。据《唐六典》卷四《礼部》记载：“大会之日，陈设亦如之，皇帝服通天冠，皇太子称觥献寿，次上公称觥献寿……外命妇朝中官为皇后称觥献寿。”<sup>[3]</sup>玄宗李隆基曾作诗《千秋节宴》，“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寿觥。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sup>[4]</sup>由文献可知银觥一般用于群臣称觥献寿的场景。

[1]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杜牧.醉后题僧院[M].上海:中华书局,1984.7.

[2] 蘅塘退士,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唐)刘禹锡.浙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M].上海:中华书局,1984.7.

[3]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四礼部[M].上海:中华书局,1984.7.

[4] 董诰.全唐文·卷 0023 (唐)李隆基.千秋节宴群臣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



图 2.8 双狮纹短柄三足金铛



图 2.9 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酒令筹



图 2.10 酒蠹



图 2.11 银酒瓮

（图片来源：2.8 来自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2.9-2.11 来自刘丽文《奢华的大唐风韵——镇江丁卯桥出土的唐代银器窖藏(下)》）

李白《襄阳歌》有“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sup>[1]</sup>的名句，诗中的铛属温酒器一类的设计。温酒时在酒铛下经火加温后，盛于铛内的酒体便可温好，然后再倒出饮用。在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出现了双狮纹短柄三足金铛（见图 2.8）、素面短柄银铛、素面长柄银铛等不同的造型设计产物。江苏丹徒县丁卯桥出土银器中，有件稍许残缺的力士银铛和两件力士银锅。河南偃师杏园李景由墓出土了短柄圆底银铛等，唐代出土文物中，这类用于温酒用的设计产物的发现，说明当时唐人习惯喝温热酒。

唐代酒令作为一个专有词汇，专指筵席上决定胜负的游戏活动方式，是唐人从文士到庶民百姓饮酒、筵席时的主要游乐方式，《菜菟夫诗话》中说：“唐人

[1] 蘅塘退士,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4. 7. 1.

饮酒，必为令以佐欢。”<sup>[1]</sup>唐代酒令名目繁多，主要以专门设计的器具为主体展开活动。和骰盘、酒令筹、酒旗、酒熏等，有些宴会中也会用到香球、花盏、酒胡子等器具才能行令。例如行筹令时，大家开始轮流抽取酒令筹，然后根据筹箸上面的指令文字来决定如何饮酒。因为这类专门设计的娱乐酒令器具广泛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宴饮，因此出现“觥筹交错”一词来形容宴饮时的愉快场面。江苏丁卯桥出土了一套专门设计的酒令用具：银鍍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高 34.2 厘米，龟长 24.6 厘米（见图 2.9）；酒令筹五十枚，出土时置于酒令桶中；酒旗八支、酒熏长 26.2 厘米（见图 2.10）。这组筵席行令专用酒器在出土唐代文物中属于首次发现。同时出土了银酒瓮为贮酒器高 55 厘米，口径 26 厘米，与白居易在《咏家酿十韵》“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sup>[2]</sup>中的瓮是同一物（见图 2.11）。综上所述，简单概述唐代金银酒器中的盛酒器设计、饮酒器设计、温酒器设计以及酒令用具设计，就已呈现名目繁多的样态，这直观反映了唐代金银酒器设计的蓬勃发展。

[1] 蘅塘退士,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4. 7. 1.

[2] 蘅塘退士,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唐)白居易. 咏家酿十韵[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4. 7.

### 第三章 从唐代金银酒器设计制造中解读贸易

#### 一、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设计制造材料中的价值

在唐朝的建立和发展下拥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和雄厚的经济基础，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强大、丝路繁盛，社会开放饮酒享乐之风盛行，再加上李唐统治集团有着游牧民族的血统对金银和饮酒素有偏好，以及统治者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因此上行下效促使金银酒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盛极一时。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步绝》中：“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姚合的《咏贵游》：“凤凰尊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sup>[1]</sup>等等唐诗都可以看出金银酒器在唐朝权贵文人心中已然成为一种时髦。

金银酒器因质料贵重、外观显示出独有的视觉面目又具备实用性等诸多价值，不同于其他材料的酒器设计制造，而备受唐人青睐。对于金银酒器的需求量极大，连带对于金银的需求也节节攀升。据新旧《唐书》记录，唐代全国采金场有十一处，采银场地五十六处。主要产金地剑南道、岭南地区和江南的饶州、信州、潭州、永州等地。而产银之地则有饶州、宣州、安南、陕州、伊阳、润州等地。总的来说，唐代金银主要产于南方地区。白居易诗云：“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乞乞无冬春。”<sup>[2]</sup>可见当时开采金银的热潮。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敏锐的嗅到了其中的商机，除了通过丝路直接交易成品金银酒器以外还开始往唐朝源源不断的运输制作金银酒器的原材料。由于金银币本身的性质使他具有价值尺度，即使波斯萨珊的金银币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其质地也决定了萨珊波斯、罗马、粟特等在唐进行贸易时使用的金银币可以当作金银原料来进行交易，这也是唐朝金银酒器材料的来源之一。外国输入的金银主要来自于西亚和中亚，唐与萨珊波斯之间通使达到 29 次，主要以朝贡的方式为唐输入金银。中亚粟特人擅长经商，往返于中亚和唐朝的粟特商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粟特地区的金银通常是粟特人通过北丝路贸易将拜占廷等地的金银转运到唐用于交换其他商品，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他们买卖金银的交易。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记载了往来唐朝的粟特人手中大量持有金银的记录。《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中记载：“起正月一日，曹迦钵买银二斤与何卑尸屈，二人边

[1] 蘅塘退士,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M]. 上海:中华书局, 1984. 7.

[2] 蘅塘退士,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M]. 上海:中华书局, 1984. 7.

得钱二文。即日、曹易婆买银二斤五两与康炎毗，二人边得钱二文。次日翟龟头买金九两半，与□显祐，二人边得□□□。次三日，何阿陵遮买银五斤二两与安婆□，□□□□钱五文。即日、翟薛畔买香五百七十二斤，鍤石参拾。”<sup>[1]</sup>官府也可在金银交易时获得税费，由粟特转手买卖的金银除了铸造货币也可作为原料制作成金银器。吐蕃地区也盛产黄金和白银，在与唐朝的求婚、讲和等频繁交往中，时常以金银作为礼品送往唐朝，而且数量庞大。

南诏国内物产丰富，金沙江，丽水节度辖地均为多产金银的地方，据《蛮书》卷七所载：“生金，出金山及长傍诸山、藤充北金宝山。土人取法，春冬间先于山上掘坑，深丈余，阔数十步。夏月水潦降时，添其泥土入坑，即于添土之所沙石中披拣。有得片块，大者重一斤，或至二斤，小者三两五两，价贵于熬金数倍。然以蛮法严峻，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熬金出丽水，盛沙淘汰取之。沙啖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长傍川界二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徭。”<sup>[2]</sup>南诏国向唐输入金银的贸易路线一般是从丽水城走南丝绸之路的西线，再途径剑南道进入长安；丽水城西南方紧挨骠国，与骠国水路相接，若从丽水城南下沿江走水路即可到达八莫，八莫是骠国境内天竺、南诏国和骠国的贸易之地。据《新唐书·骠国传》记载骠国盛产金银铅锡和琉璃珠宝：“王居以金为甃，厨覆银瓦，爨香木，堂饰明珠。有二池，以金为堤，舟楫皆饰金宝…王出，舆以金绳床……（王城）铅锡为瓦，……（百寺）琉璃为甃，错以金银，……（王）戴金花冠、翠冒，经络以杂珠。王宫设金银二钟，……以金银为钱，形如半月。”<sup>[3]</sup>这段记载说明骠国金银产量巨大，因而骠国与南诏国通过南丝路为唐朝输入源源不断的金银等自然资源换取本国所需。

马可波罗在游历了整个亚洲以后称日本是黄金之国，并在《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八章中对日本进行了描绘：“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sup>[4]</sup>由此可见日本黄金的产量丰厚，公元七四九年日本北部发现大量砂金并且陆续在国内发现金银矿藏并积极开采以后，成为亚洲主要的黄金生产国，不仅可以做到自给

[1] 齐东方. 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J]. 考古学报, 1998(02): 153-170.

[2] 樊绰. 蛮书[M]. 北京: 中国书店, 2007. 2.

[3]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骠国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

[4]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纪[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 331.

自足还有能力对唐朝进行黄金贸易输送。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丝路在八世纪之前基本沿用南朝时代的道路，从日本开始，东渡朝鲜海峡，抵达朝鲜半岛，然后再渡过黄海经山东成山角，最终抵达建康。八世纪，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后和日本的关系就始终陷入紧张状态，由于以前的贸易航路已不能直接的往返唐朝和日本之间，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开拓出两条路线其一是从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启程，横渡东海至奄美大岛，往北方行驶经过诸岛横跨大隅海峡到鹿儿岛再顺海岸北上到博多大津（今福冈），再向东行到难波（今大阪）。另一条路线则是从江浙沿海岸的港口城市楚州（今淮安）、扬州、温州、苏州、台州等港口启程，向东北方斜穿过东海，再到达日本的值嘉岛，最终抵达日本博多大津和难波。

从南丝绸之路的陆海两条运输金银的路线来看，制作金银酒器的原材料最终运输地点的终点都集中在南方，而唐朝南方本身也盛产金银，此时的唐朝南方的金银材料数量充足。中晚唐时期，唐朝中央政府官署和皇室的金银酒器大都来自于南方地区制造，《新唐书·地理志》有明确记录，当时全国向上进贡金银酒器的地方有五处，分别是江南西道宣州、淮南道扬州、贵州、剑南道绵州、岭南道桂州。这五处均属于南方地区，其中又以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居多。目前从考古发掘中带有铭文的南方进奉金银酒器制造地点十分明确，如江南东道的越州、江南西道的洪州、宣州、润州等地，这些地点均与南丝路的途经城市、港口一一对应，有大量的官营业或私营金银制造坊和大量的工匠。这就是为何在唐中后期，从南方制作的金银酒器无论是从数量、工艺、设计纹样等方面都逐步超越甚至取代北方设计制作的金银酒器的原因之一。

## 二、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设计制造工艺中的价值

在唐朝，学习金银器制作是掌握各种技艺中所需要时间最久的一类技艺，《唐六典》少府监条记载：“凡教诸杂作，计其功之众寡与其难易而平均之，功多而难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为等差，而均其劳逸焉。注曰：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铸、钨、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sup>[1]</sup>由此可见，金银酒器设计制作的复杂工艺，明代典籍引用《唐六典》时说唐代金银器的设计工艺有十四种，即披金、泥金、拍金、镀金、圈金、贴金、织金、研金、镂金、销金、捻金、钺金、嵌金、裹金。唐时的称谓有些现在已经

[1]（唐）李林甫. 唐六典[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4. 7.

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技术用语分别是鎏金、掐丝、金银错、炸珠、焊接、錾刻、金银珠焊缀、镶嵌、铸造、捶揲、金银平脱、铆接、切削和抛光。《安禄山事迹》在记述玄宗赏赐安禄山金银器时提及了金花银器、金平脱、金花银双丝、金镀银、银平脱等技术名称。从金银酒器的设计制作工艺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设计制作工艺初期表现出模仿学习西方设计与工艺的明显特征，尤其是与唐朝有密切丝路贸易往来的萨珊波斯、粟特、罗马拜占庭（大秦）等国家的设计与工艺特征，因此本节以出土金银酒器为依据将唐朝分为四个时期归纳出其设计与工艺特征和演变规律，来探寻唐与各国的丝路贸易交流。

第一期：初唐到高宗年间（公元六一八至六八三年），主要发现敖汉旗李家营子、西安何家村窖藏、西安沙坡村三处出土地。第一期的设计与工艺特征是：

1. 何家村出土的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见图 3.3）、伎乐纹八棱金杯（见图 3.1）、何家村忍冬纹金带把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见图 3.2）等此类杯体厚重，都属于浇铸而成的酒器。

2.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局部鎏金，刻好花纹后再鎏金。

3. 装饰区域通过錾刻出 S 形或 U 形瓣、其中錾刻 U 形装饰瓣的设计制作工艺与中亚、西亚六世纪时的银器设计工艺风格很接近。

4. 何家村乐伎纹银八棱带把杯的环形柄上焊接平鍑的胡人头像，是初唐金银器设计中接受波斯萨珊银器设计深远影响下的突出特点。

5. 何家村出土双狮纹短柄三足金铛以及同期出土的三个素面银铛和云瓣纹银碗（见图 3.4）等在碗底或铛底有焊接的模冲装饰圆片，从而使器型表面出现双层底面，这是第一时期设计产物最突出的特征，这种设计工艺风格在公元三世纪时盛行于西亚。

6. 金筐宝钿团花金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初级设计仿制特点，筐饰造型设计与加工笨拙宁捏，铆接水平也不高，表明这一时期的金筐宝钿技术尚显生疏。



图 3.1 伎乐纹八棱金杯



图 3.2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图 3.3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图 3.4 云瓣纹圆底银碗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第二期：武则天到玄宗年间（公元六八四至七五五年），主要来源于西安的沙坡村、何家村、韩森寨等地。第二期的主要特征是：

1. 如，何家村鹦鹉纹提梁罐（见图 3.5），从花纹看设计工艺属于金花银器，局部鎏金，刻好花纹再鎏金。

2. 此时期多为锤揲金而成的银酒器设计，造型简洁。

3. 铸造酒器减少，设计及工艺逐渐简化。

4. 金银酒器的设计风格及制作工艺开始本土化发展。

5. 金银珠焊缀已经逐步替代了在器物内底焊接模冲装饰圆片的设计手法，但动物或植物的纹样仍然是使用模冲工艺，具有萨珊设计风格。

6.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的设计属于凸花纹样工艺（见图 3.6），一般采用双层贴焊法，也就是单独用一片金片或银片，捶打模具制作成凸起的纹样，然后再贴焊至器体腹部或底部，此外还有一些是直接在器体上捶打出凸起的纹样，之后再用篆刻或线刻方法等方式加工局部细节以体现整体的设计意图。

7. 器皿底部多见炸珠设计的工艺。



图 3.5 鸚鵡纹提梁罐



图 3.6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第三期：肃宗到宪宗年间（公元七五六至八二零年），主要出自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辽宁喀喇沁旗等窖藏，第三期的特征是：

1. 金银酒器设计成局部鎏金，鎏金后再刻花纹，与第二期局部鎏金工艺有所区别。
2. 锤揲酒器造型设计变得繁复。
3. 将金银酒器表面设计成用圆形錾刀錾出细小紧密的小圆圈，圆圈纹样排列整齐形似珍珠纹的样式。

第四期：穆宗到哀帝年间（公元八二一至九零七年），主要出自西安市耀县柳林背阴村、蓝田杨家沟、浙江长兴县下莘桥、江苏镇江丁卯桥等窖藏及浙江临安水邱氏墓，第四期特征是：

1. 錾刻纹路松散，錾痕之间基本上都是断断续续。
2. 鎏金工艺流行满地装，局部鎏金，鎏金后再刻花纹。
3. 多为锤揲器皿，但器体轻薄。
4. 产生新的工艺，“碎线”式的刻画装饰技法。
5. 凸纹花样工艺常使用模具，将纹饰捶打出或压出。
6. 筐饰设计是中国纹样，线条优美，给人一种别致与轻快的感觉。

综上所述：唐朝金银酒器的设计制作工艺分为成形工艺和装饰工艺两大类。成形工艺主要有范铸和锤揲。是造型设计的达成手段范铸是金银酒器设计加工工

艺最初使用的加工方法之一，源自于青铜器铸造工艺，这种工艺对金银质地的材料来说既费料又耗工，在唐早期金银酒器多为皇室贵戚所有，对酒器设计追求宏大华美，不惜工本，如何家村出土的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伎乐纹八棱金杯都属于浇铸成形的酒器，虽篆刻纹样带有明显的波斯萨珊特点但杯体成型的方式还是本国固有工艺。此后范铸在捶揲技术成熟之后就逐渐减少使用了。在二、三、四时期设计制作的金银酒器基本就是捶揲辅以焊接等方式形成。我国商周时期在金银器设计制作中就有捶揲技术但技术青涩且多用于金银饰品当中。但捶揲技术却是西方金银酒器中最常用的制作方法，最早出现在西亚、中东地区。唐代成熟进展的捶揲工艺主要是吸收来自粟特等外来的金银酒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受域外技术影响最深的工艺技术。唐朝金银酒器的设计制作能达到顶峰与捶揲工艺的发展进步有着密切关系，工艺手段作为一个器物造型设计得以展现的基础，一定程度决定了设计水平的高下。

装饰工艺里设计产物视觉效果优劣的保证有鎏金、掐丝、炸珠、金银珠焊缀、焊接、篆刻、镶嵌、模冲等。篆刻技法在我国和西域的起源都很早，至唐朝时真正发展成熟，被唐工匠熟练运用于金银酒器的设计制作中也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粟特篆刻技术对唐代金银酒器设计的影响。何家村乐伎纹八棱杯其器身设计使用范铸法，而表面人物装饰设计则是使用篆刻工艺雕刻，从此杯身上可以看到唐与粟特设计风格相融合痕迹，但融合程度、设计、工艺水平并不完善。再看晚唐时韩森寨出土的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和咸阳出土的鸳鸯蔓草纹金壶，篆刻美好寓意图案，线条流畅优美，融合萨珊风格器型设计的特点，使两者相得益彰。

凸纹装饰工艺也叫模冲工艺，主要源于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萨珊波斯金银酒器设计中的装饰物主要是以凸纹法锤出具有立体感的主饰，然后用阴线的纹样加以篆刻，勾勒出轮廓和细节，在第一，二期时对金银酒器的装饰设计工艺产生了较大影响。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设计，将酒壶身通过捶揲后焊接而成，两面的动物纹饰采用模冲工艺。在第三、四期唐匠人在使用模冲工艺后加入了属于唐自己的设计语言，阴篆刻纹饰，鱼子纹底。如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觞的设计、鎏金鸳鸯纹提梁银罐的设计，使纹饰饱满增加华贵感，是一种凸显视觉效果优异性的表面处理手段。除了捶揲成型工艺和模冲工艺，金银酒器设计工艺中还有一个可以

凸显唐朝贸易交流频繁的例证,就是在何家村出土双狮纹短柄三足金铛以及同期出土的三个素面银铛和云瓣纹银碗等在碗底或铛底有焊接的模冲装饰圆片,从而使器型表面出现双层底面,这是第一期最明显的器物造型设计特征。这种装饰工艺在伊利亚王国贵族墓葬出土的银碗中也有发现,流行于西亚地区。在二期之后这种装饰设计工艺逐渐被金银珠焊缀的工艺,取代了在器物内底焊接模冲装饰圆片的手法,但动物或植物仍然使用模冲工艺,具有萨珊设计风格。

从唐代四个时期金银酒器设计制作工艺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第一时期的金银酒器设计制作工艺有强烈的萨珊波斯和粟特设计风格、拜占庭设计风格、吐蕃的设计风格以及处于模仿学习其工艺技术初期的显著特点。在河北宽城出土的粟特素面银执壶,西安西郊出土的粟特银碗,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猊纹银盘、胡人头执壶、带把杯、长杯,在西安沙坡村粟特鹿纹银碗以及西安何家村乐伎纹银带把杯这些出土文物的造型设计中都可清晰看到,此时的唐朝从中亚、西亚、吐蕃地区输入了大量的金银酒器。由于统治阶级和贵族对金银酒器的钟爱,其始终是北丝路重要的商品之一。并且金银制品价值昂贵,利润高,市场需求大还便于携带贩卖,所以这些使者和精明的商人用朝贡金银酒器的方式换得唐王朝的赏赐,进行朝贡与赏赐的噱头下的贸易活动。从第二、第三时期可以看出比第一时期设计及工艺上显著的进步,反映出设计方法和风格自西向东的流传和融变的动态过程。粟特人向来善于经商,他们辗转于欧亚内陆,在利益的驱使下,不仅不断地向唐输入金银原料及成品酒器还带来了技艺精湛的金银器制作匠人,唐朝包容开放的社会制度和民风和生活环境留住了这些工匠的人 and 心,留在唐王朝的匠人不断和唐匠人互通有无,相互学习,这就使得唐的金银酒器设计制作工艺这个时期有飞速的发展,并开始推陈出新,尝试更符合唐人审美的装饰工艺。从第四期的金银酒器稳定成熟的设计加工工艺,可以看出此时的工艺技术已经完全融会贯通了外来技术,形成了属于我国独特的装饰工艺技术,是金银酒器设计加工工艺的繁荣阶段。主要以南方制作的金银酒器为主,锤揲的酒器壁薄且重量轻,纹饰篆刻变成深刻、凸雕为浅刻、浮雕;应用小车床切削、抛光等,将制作工艺速度提高,过程简化。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一方面原因是战争而造成北丝路贸易急剧萎缩,并逐步被南丝路所取代,与此同时唐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南方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金银业市场,如苏州金银行和扬州金银行。并

且这些城市也是金银材料的进出大港。另一方面是南方私营金银作坊减少成本，增加利润的结果，与原来皇亲贵戚所把持的少府监的金银酒器厚重华贵的设计加工工艺截然相反。金银酒器的设计加工工艺展现出突出的时代特点、工艺水平、地区、文化等的差别，以及在继承中外设计加工工艺时要是一个扬弃的发展变化。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在丝路贸易中不同传统、风格与技术交流过程中导致的设计产物加工、制作工艺阶段性特征的形成。

### 三、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造型设计中的价值

金银酒器的造型设计与唐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审美旨趣息息相关，从而反映出丝路贸易的发展变化。酒器造型设计的变化都有迹可循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来，随着南北丝路的繁盛，经济贸易发达，唐朝的胡风盛行，影响了唐人的生活习惯，审美趋向，自然也就影响了酒器的造型设计的变化。

由于唐代金银酒器的造型设计种类过于繁杂，金银酒杯这种造型设计产物在文献与出土文物中更为常见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本节以唐代金银酒器中的杯这种造型设计产物为例进行分类论述，按照其杯子造型可以分为六种类型：

A. 高足杯，其造型设计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口部为圆形或多曲圆型的杯体，用来盛装酒体；底部则为喇叭状底部以及高脚，具备放置和手执的功能。目前所知都为银酒器辅以鎏金。高足杯一般用以喝葡萄酒以及收藏。又以高足杯杯腹，高足中部造型有所不同分为三型。

AI型，杯体设计较深，杯深大于口径，杯腹壁呈直线状，高足细且在中间有椭圆式的节。以西安何家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如图 3.7 所示)、何家村素面筒腹银高足杯(如图 3.8 所示)、沙坡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临潼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如图 3.9 所示)，北京大学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弗利尔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以及纽约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的造型设计(如图 3.10 所示)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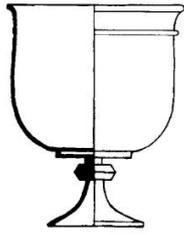


图 3.7 何家村素面筒腹银高足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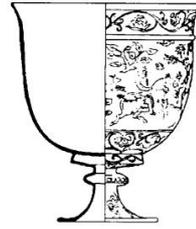


图 3.8 何家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

(图片来源: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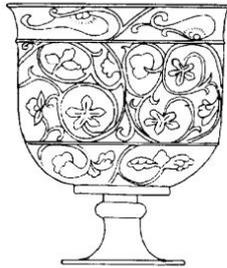


图 3.9 临潼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



图 3.10 纽约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

(图片来源: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A II 型, 杯体浅, 口径大于杯体深度, 折腹, 呈碗状。以沙坡村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见图 3.11)、沙坡村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见图 3.12)、沙坡村折枝纹弧腹银高足杯的造型设计(见图 3.13)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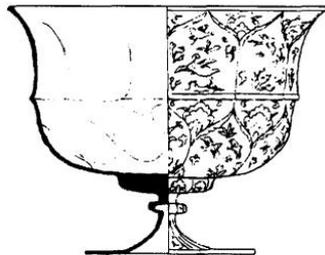


图 3.11 沙坡村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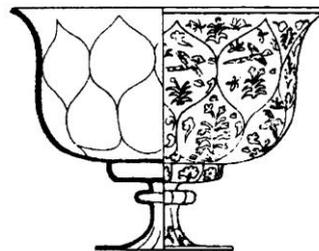


图 3.12 沙坡村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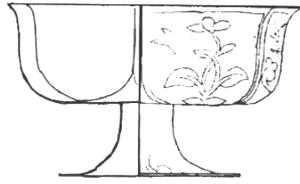


图 3.13 沙坡村折枝纹弧腹银高足杯



图 3.14 淳安素面银高足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AIII型，杯体呈现花瓣状型态，高足粗壮，呈倒扣喇叭形圈足。浙江淳安素面银高足杯（见图 3.14），陕西耀县背阴村素面银高足杯（见图 3.16），江苏丁卯桥窖藏素面银高足杯（见图 3.15）为代表，主要是晚唐流行的样式之一。



图 3.15 丁卯桥素面银高足杯



图 3.16 背阴村素面银高足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B. 八棱带把杯，杯体深，杯身瘦高，杯腹被凸棱分为八个区间呈八棱状，内壁略有弧度，杯体下部有横折棱，矮圈足，手柄为平鍔环形柄，有金银两种质地。以何家村人物纹八棱金带把杯、何家村乐伎纹八棱银带把杯、何家村人物忍冬纹八棱金带把杯（见图 3.17）、韩森寨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的造型设计（见图 3.18）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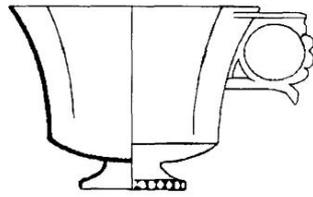


图 3.17 何家村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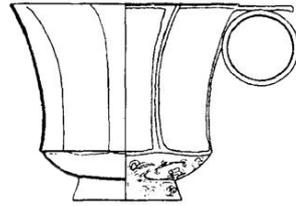


图 3.18 韩森寨缠枝纹银带把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C. 筒状带把杯，杯体深，杯口呈侈状，杯腹为筒形内壁有弧度，且没有竖棱分割杯体，杯体下部有横折棱，矮圈足，六字形环柄，金银两种质地。以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见图 3.19）、沙坡村素面筒形银带把杯（见图 3.20），韦洵折枝纹银杯的造型设计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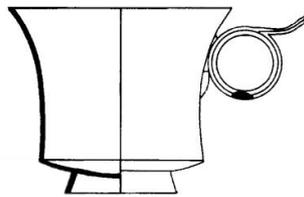


图 3.19 团花纹金带把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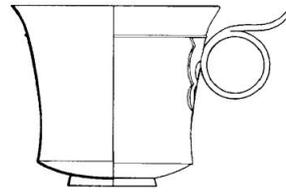


图 3.20 沙坡村素面筒形银带把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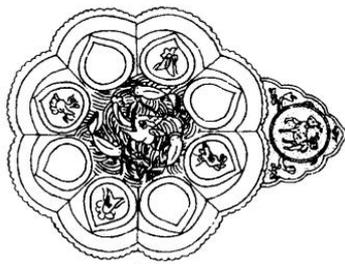


图 3.21 何家村侍女纹银带把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D. 碗形带把杯，圆底碗形，平釜环形柄。以何家村侍女纹银带把杯的造型设计为代表（见图 3.21）。

E. 罐型带把杯，杯体深，杯体呈罐状，鼓腹，杯壁较薄，束颈，环柄上有指头垫。以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西安出土的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带把杯的造型设计为例（见图 3.22）。



图 3.22 左边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右边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带把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F. 长形杯，杯体深浅不一，杯体由于有分曲导致的曲形棱所以外壁有凹陷，因杯体平面不同分为两型。

FI 型，杯体深浅不一，平面呈多曲椭圆形，矮圈足。以西安鹦鹉纹银长杯（见图 3.23）、西安鸿雁纹银长杯（见图 3.24）、背阴村双鱼纹银长杯（见图 3.25）、齐国太夫人双鱼纹金长杯（见图 3.26）、下莘桥素面纹银长杯、背阴村素面银长杯、西安摩羯纹金长杯（见图 3.27）的造型设计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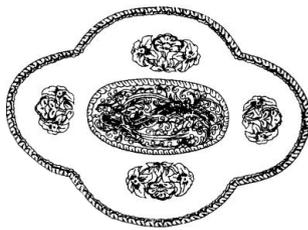


图 3.23 西安鹦鹉纹银长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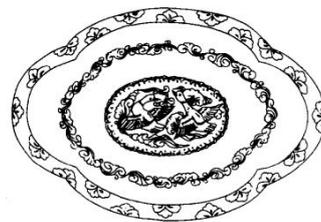


图 3.24 西安鸿雁纹银长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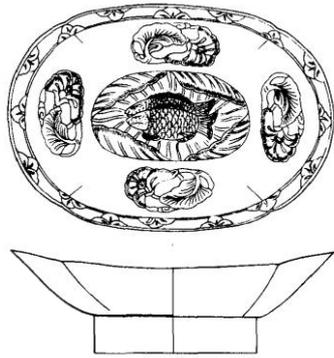


图 3.25 背阴村双鱼纹银长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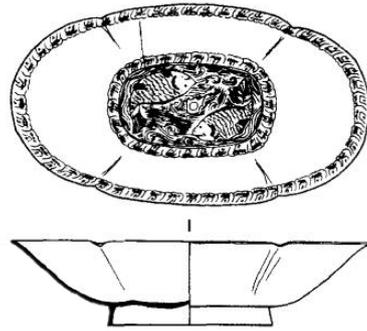


图 3.26 齐国太夫人双鱼纹金长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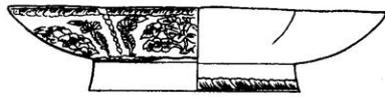


图 3.27 西安摩羯纹金长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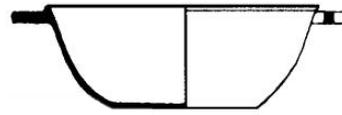


图 3.28 何家村银双耳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F II型，平面呈椭圆形，杯体浅，不分曲，没有圈足，杯体两端有片状双耳。以何家村双耳银杯的造型设计为例（见图 3.28）。

以上六种金银酒杯的造型设计受西域外来设计风格的影响颇深。高足杯外来风格浓厚主要源于罗马拜占庭式器型设计启发，长形杯是典型的波斯萨珊时期的酒器造型设计风格<sup>[1]</sup>。八棱带把杯、筒状带把杯、碗形带把杯以及罐型带把杯则是粟特酒器的造型设计最为常见的一类。从中国出土的文物中多少都能看出，这些西方国家经过漫长的丝路旅程对唐代金银酒器的造型设计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唐朝所指的西方主要是与唐王朝有密切贸易的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如北丝路经过的贵霜、突厥、白匈奴、萨珊、罗马、粟特、大食。这些都是北丝路上设计制作金银酒器十分发达的国家，其中酒杯造型设计最能反映与粟特、萨珊、罗马三个国家设计的密切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与其他西方国家的造型设计风格无关，因为中亚、西亚、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金银器造型设计本身蕴涵着历史文化和宗教等等的信息，酒器造型设计本身就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

[1] 齐东方,张静. 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J]. 考古, 1998, (06):63-73.



图 3. 29 埃尔米塔什山羊纹银带把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中亚地区的粟特人精明且勤劳，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的国家，在丝路上扮演者贸易转运者的身份同时也是欧亚文明的向导。粟特地区更是东西交通的枢纽。在中国发现的有关粟特的金银酒杯中，一部分是从丝路输入唐朝的粟特银酒杯而另一部分酒杯则是唐朝工匠按粟特酒杯进行的器物仿制。李家营子出土的素面罐形带把杯和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素面罐形银带把杯造型设计一样，均为罐形，杯体扁圆，鼓腹，束口，圈足外侈呈倒喇叭状，腹部有环形手把（见图 3. 22）。除此之外，我国再无与这两种罐形带把杯的相似造型设计的酒杯，在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珍藏的山羊纹银带把杯的造型设计形式与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和何家村素面银带把的造型设计很接近，埃尔米塔什山羊纹银带把杯（见图 4. 29）被认定是粟特或伊朗东北部呼罗珊地区的设计产物，都属于中亚地区的造型设计风格，尤其是七世纪至八世纪的粟特最为盛行的金银酒杯造型设计，所以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和何家村素面银带把杯应属于粟特输入唐的银质酒器。齐东方先生认为：“发现李家营子素面银带把杯的遗址，李家营子墓 1 所出的银器不像是通常墓葬中的随葬品，这几件银带把壶、带把杯、长杯、盘。恰好是一套餐饮用具，简洁、实用，又便于携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们是外出旅行者的简单餐具。”<sup>[1]</sup>由这个出土遗址的地点来猜想，或许这是来往于北丝路的商人亦或者是旅行者，途遇不测草草掩埋于此地。七十年代开始，在我国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一些西方输入性的金银酒器设计产物，如宁夏固原出土的鎏金银壶，山西大同出土的多曲银杯、鎏金铜杯，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出土的喀喇沁双鱼罐形银壶、河北宽城出土的素面银执壶等，这些发现的金银酒器设计可以充分

[1]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证明有一条经过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再通过河北入内蒙古，进入辽宁的北丝路分支。初唐，李唐统治集团对外精力主要放在西北地区，其目的之一是通过北丝路与西方进行交流，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北方的发展，设幽州、营州管辖北方事务，寄希望于从游牧民族占据的丝路分支上获得利益。

唐朝除了出土的两个罐形带把杯是输入的酒器以外，筒形带把杯和碗形带把杯从造型设计和纹样设计上来看应是唐朝在粟特金银酒杯设计风格和构成的影响下的创新性设计产品。研究筒形带把杯和碗形带把杯造型设计中粟特式器型设计在唐代的发展轨迹，可以据此研究粟特和唐王朝丝路贸易中的经济贸易文化影响。目前粟特地区出现的十几件带把银杯，杯体设计有八棱形、筒形以及碗形等造型类别，一部分是折腹一部分是杯体底部有横折棱，侈口，杯腹环柄平鍑花纹，以人像为主，花草纹为辅。八棱带把杯和筒形带把杯出现在七世纪到八世纪，碗形带把杯和罐形带把杯的造型设计出现在八世纪中叶以后，与此同时八棱带把杯的造型设计不再出现。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沙坡村素面碗形银带把杯、何家村人物纹金带把杯、何家村人物为冬纹金带把杯、何家村乐伎纹银带把杯、韩森寨缠枝纹银带把杯、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等唐朝带把杯的造型设计的时代均在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酒杯的造型设计有所差异但没有演变关系。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一种新器型的出现都不是平白无故的，一定与当地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密切相关，如此这个器物才会有生命力和延续性。可以认为带把金银酒杯的造型设计在唐朝出现，标志着从丝路而来的粟特设计文化已然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唐人的生活，带把金银酒杯的造型设计在唐朝的强势流行也意味着此时有大量的粟特人在唐王朝活动。何家村乐伎纹银带把杯、何家村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中的杯体造型设计与粟特银器造型设计一致且环形柄由大联珠组成，和黑海沿岸出土的七世纪金带把杯造型设计一样，是突厥和粟特的设计风格混合之后的造型设计样式，从造型设计的角度上看无法将它与粟特银杯的造型设计区别开，所以这不是唐朝设计匠师所能完成的作品。但这也不是纯粹外来输入酒杯，因为这两件带把杯均采用唐朝传统范铸工艺，而粟特对金银器的制造工艺最常采用锤揲技术，器体轻薄，所以推断是粟特工匠在中国所设计制作的金银酒杯。从中国各地出土了不少类似的金银酒器来看此时期在唐朝已有大量的粟特设计匠师在唐朝工作生活。在西安、洛阳、宁夏固原均有出土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墓志铭和墓葬群，从敦

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也有粟特人在唐朝大量居住的记载。《唐神龙三年（公元 707 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是在吐鲁番出土的户籍中记载：“残存户主名 47 人，属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达 25 人。”<sup>[1]</sup>如同敦煌从化乡一般，此处就是粟特人聚集扎根之处。“从化”、“崇化”这些地方使用的乡名，指“归化”唐朝的外族人驻扎之地。唐代政府对粟特人的出现并不排斥，而且对他们的安置也是有计划安排的。记录户籍内容的时代是八世纪中叶以前，与本文讨论的唐代金银带把杯的造型设计出现的时代一致。这些移民到唐的粟特人一般都是跟随丝路上的商队，追求利益慕名来到唐王朝，主要在唐朝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萨珊存在于波斯王朝三世纪到七世纪，以金银器设计制作工艺精良、优异闻名于世，椭圆形多曲瓣状长杯造型是萨珊王朝最具代表性的金银酒器造型设计样式之一。公元 651 年萨珊战败于阿拉伯，萨珊王子卑路斯和大量萨珊人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萨珊金银器工匠流亡至唐，寻求唐王朝的庇护。虽然萨珊灭亡但波斯风格的设计样式和格调的渗透和影响还在延续。唐代金银酒器造型设计中最能代表萨珊风格的是金银长杯，造型呈多曲瓣和萨珊长杯的造型基本一致，但又显示出唐独有的设计特点。这说明萨珊长杯的造型设计风格在七世纪中叶左右对唐金银酒杯的造型设计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白鹤缠枝纹银长杯和旧金山缠枝纹银长杯的造型设计中唐朝工匠在尽可能的模仿萨珊长杯造型设计中的优异之处并开始逐渐中国化。在其造型设计的演变过程中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逐渐将八曲改为四曲，每曲的凹线直通碗底；其二是保持八曲不变但是加深杯体深度，圈足呈倒喇叭状且高，同时结合更符合唐人欣赏习惯的荷叶纹。萨珊长杯造型设计在唐朝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是唐朝工匠的创新了金银酒杯的造型设计样式。正如齐东方先生在《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一文中所说：“萨珊长杯传入唐王朝后，经过由仿制到创新的演变，虽然逐渐消失了本来的特征，却反映了外来文化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开放的唐朝，政府宽容的政策和广泛的多边交流，使人们学习和创作的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并以极大的自信和独立性进行改造、创新。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演变，清楚地反映了唐代工匠通过模仿和改造，使之变成中国化器物的发展轨迹。”<sup>[2]</sup>

高足杯不属于中国传统器物造型设计的样式，是由西亚、中亚地区输入唐朝。

[1] 齐东方. 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J]. 考古学报, 1998, (02): 153-170.

[2] 齐东方, 张静. 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J]. 考古, 1998, (06): 63-73.

日本学者桑山正进认为：“高足杯是四世纪和五世纪罗马流行的器物，后传入中亚，中国的高足杯祖型源于火土罗地区。”<sup>[1]</sup>高足杯最初是罗马风格的设计器物，拜占庭时期沿用。唐代金银高足杯造型的设计理念应是源于拜占庭同类器物造型设计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萨珊长时间控制着唐朝通往拜占庭的丝路要道。拜占庭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查士丁二世于公元 568 年就曾遣使到西突厥的可汗庭，并打算绕道同我国交流。裴矩的《西域图记》序也描述了通往拜占庭的三条商路：“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森国。达于西海。”<sup>[2]</sup>此路线需绕道黑海，并主要通过黑海北岸出高足杯的地区。而最重要的是经由海路，如公元 531 年拜占庭曾推动其盟友，埃塞俄比亚国王与印度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将我国丝绸运往拜占庭，但未能实现，这已经表明了拜占庭对经由海上与中国交流的浓厚兴趣。唐代高足金银酒杯出土较多，目前已知的就有 30 余件，可见高足杯在唐朝十分的受欢迎。



图 3.30 隋代虞弘墓壁画

[1] 齐东方,张静.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J].考古,1998,(06):63-73.

[2] 魏徵.隋书·裴矩传[M].上海:中华书局,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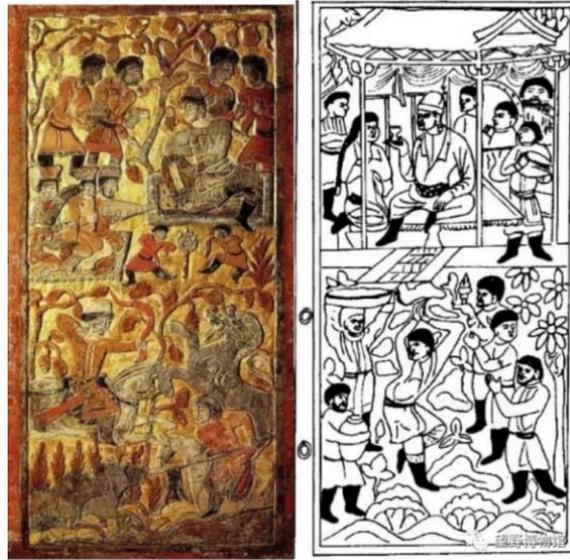


图 3.31 北周安伽墓

(图片来源：网络粟特人在中国\_公元 (sohu.com))

在我国发现的隋代虞弘墓（见图 3.30）和北周安伽墓（见图 3.31）等粟特人领袖的墓室图像中也常看到高足杯，学者荣新江先生指出，高足杯曾是当时胡人食用葡萄酒的主要器皿。唐代金银高足杯这类设计产物的大量出土意味着葡萄酒酿酒技术在唐朝的迅速发展和葡萄酒在唐朝逐渐普及，不再是少数贵族才能品尝的珍贵酒品。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把西方的葡萄种子带回中土。即使如此，因为种植经验不足等因素，我国的葡萄产量并不高。直到唐朝初期，西域葡萄在唐代还属于不常见到的珍贵水果。《新唐书》中记述，唐高祖李渊曾宴请群臣，宴席中就有葡萄，其余大臣吃的都很欢快，唯独宰相陈叔达要把葡萄打包带走。唐高祖很奇怪遂问他：“你为什么不品尝一下再带走呢？”陈叔达回答：“微臣母亲生病，有口干症状，想吃葡萄却常常吃不到，因此我才舍不得吃想要带回去给母亲吃。”陈叔达的孝心很感人，也从侧面反映出：连宰相都很难吃到葡萄。可见初唐时期葡萄有多么难得。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大唐的部队平定高昌国，并设置了西州，因此，葡萄和葡萄酒也变成了西州的重要贡品。不过，单纯依赖西州一地的葡萄还远满足不了唐朝人的生活需求。所以，唐太宗开始大量从西方国家引入葡萄，连后来的文人刘禹锡也说道：“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随

着西方葡萄的大量传入，唐朝的葡萄种植也打破了深宫禁苑的禁锢，走向了平民大众。唐朝大臣沈佺期曾感叹道：“杨柳千条花欲绽，葡萄百丈蔓初紫。”描绘了长安城里葡萄上架，以及葡萄蔓舒展时的生机勃勃、壮丽可人的情景。可以说，随着时光的推移，葡萄之于唐代的中国人来说已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从西方引进的葡萄也逐步在唐朝各地普及，包含了唐朝的河东道（今山西省含河北、河南、内蒙古部分地区）是唐朝葡萄种植的面积最大的种植区，河东的葡萄在唐朝很有名气，属于驰名品牌。《太平广记》卷 233 引《唐国史补》卷下有云：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溢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sup>[1]</sup>河东葡萄酒跻身当时全国名酒之列。除了河东道的并州、代州、蒲州等，陇右道的西州、沙洲的葡萄种植以外还有关内道的长安、同州、雍州，河南道的洛阳，江南道的润州，山南道郢州，吐蕃。这些葡萄种植的地区与金银酒杯的设计制造与出土地区高度重合。唐代葡萄酒酿造属于胡人的“专利”。酿酒技术是胡商开设酒坊或经营酒店的根本条件，为垄断葡萄酒的生意胡商一般不会轻易传授他人酿酒技术。所以，当时汉人通常无从了解葡萄酒的酿造技术。由此可知，唐代葡萄酒酿制的这种“技术壁垒”使之无法大规模普及和推广。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六零四年）才打破这一现象，这一年首次记录了长安城自酿葡萄酒的过程，在《太平御览》卷 972 引《唐书》中说：“蒲陶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醞酮，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sup>[2]</sup>这说明唐太宗在积极试用、改进高昌葡萄酒酿造技术，结果是酿造出八种不同口味的葡萄酒，它们芳香酷烈、别具风味。奠定了唐都长安作为唐代酒业发展的中心并且夯实了长安成为葡萄酒的重要酿造基地的基础。不仅如此，葡萄种植区域在内地得到了极大扩展，葡萄栽培技术得到了明显提高，而且葡萄酒的产地扩大了，葡萄酒酿造技术也有了提高。葡萄和葡萄酒在唐代丝绸之路一带上是粟特人从西域带到唐朝的重要经济商品之一，葡萄园栽培和葡萄酒酿制也往往是一体的。在出土文书中，还记录了葡萄酒为官府主要征收的赋税之一。粟特商人对葡萄酒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

[1]（宋）李昉.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M]. 上海: 中华书局, 2013.

[2]（宋）李昉. 太平御览·卷 972[M]. 上海: 中华书局, 2000.

当人们品尝到了扑鼻的酒香和极大的喜悦，就会以更大的积极性去研究生产谷物蔬果和设计制造酿酒用的器皿，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得美酒供给，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金银酒器的造型设计下发展的强大动力。从金银酒杯造型设计便可见微知著。在经济包容与开放的唐时代，外来设计文化在唐逐渐中国化的过程，唐代设计和复杂多变的异族设计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各国设计文化交流的积极态度，它们传递出丝路贸易于设计实践及产物而言的重要的商业价值也从一个具体的角度诠释了贸易与文明、贸易与文化推广之间的紧密关联。

#### 四、贸易在唐代金银酒器纹样设计中的价值

纹样是极具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审美艺术价值的视觉设计产物，任何纹样都不会凭空出现，都是一定时期社会环境、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反映。纹样设计所需的原型基本分两部分组成，一种是由实际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发展而来的，而另一种则是由人们自身的希望演化出来的现实中未必真实存在的产物。本节将通过唐代金银酒器的纹样设计探寻在丝路贸易中唐朝与沿途各国在设计及泛设计（文化、艺术、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交流融合。

唐代金银酒器装饰纹样设计可以分为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和人物纹。唐代金银酒器纹样中几何纹样种类繁多，例如折枝纹，连枝纹、水波纹、联珠纹、卷云纹、鱼子纹等，其中以圆点连缀而成的联珠纹设计最具外来设计风格，反映了粟特设计文化的特点，多见于唐前期金银酒器设计。联珠纹本身也可以作为主要装饰设计的元素，但通常用来辅助间隔其它纹样，如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见图 3.32）、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见图 3.33）的杯口、底圈及把柄上的视觉化处理。出土于基洛夫州的野山羊纹单耳杯的圈足底部有一圈联珠纹，由大颗的金珠焊接在圈足表面。可见凸鼓式的联珠纹是粟特银器设计的重要风格特征之一。联珠纹在粟特设计样式的设计产物中出现与粟特信仰祆教（拜火教）有关，祆教崇拜太阳、月亮、星星，认为其代表光明，是善良的象征。从品治肯特遗址的安伽墓石棺的一侧描绘了粟特人与突厥人会面的场景，这副石刻画的周围就是用联珠纹围起来的长方形画面，还可以看到粟特人在图中做了太阳和月亮的装饰（见图 3.34）。由此可以判断联珠纹的圆形象征太阳，是祆教崇拜太阳的物化象征。在初唐这种联珠纹设计还在金银酒器的装饰设计中被大量模仿，到唐中晚期后联珠纹的设计样式就基本不再出现了，这是因为祆教的做法违背了唐王朝的

公序良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所以唐朝统治者在一段时间里禁止祆教在唐的传播，直到公元八五四年，唐武宗颁布了灭法令，由此联珠纹一类的设计样式彻底消失了。



图 3.32 何家村乐伎纹银带把杯足底



图 3.33 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口沿



图 3.34 何家村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足底及纹样



图 3.35 双狮纹金钁内底部纹样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动物纹一直是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纹样设计题材，在唐代金银酒器中动物纹样设计也是丰富多彩，除了传统动物纹鸿雁纹、鸳鸯纹、兔纹以外还出现了传统动物纹样设计中不常出现的动物纹样设计，如狮纹、摩羯纹、鹦鹉纹、鸟衔绶带纹、舞马纹、飞廉纹等。这些动物纹不仅是用于装饰设计，而且更是表达了一定的信息成为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类产物，如，将祥瑞之念寄寓动物以期获得内心的

慰藉。以狮子为纹样的设计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狮子装饰在杯体的中央，作为主题纹样，如双狮纹九瓣单柄金铛（见图 3.35），金铛内底以双狮为中心，周边围绕麦穗纹圆框，是萨珊金银器图形设计中常见的徽章形式；双狮纹十六瓣银碗底部使用模冲工艺两只相对的瑞狮，口衔折枝花边缘一圈绳索纹装饰。另一种则是装饰酒器腹部作为辅助纹样，如奔狮唐草纹银碗外腹部以葡萄、忍冬、卷草缠绕布局分成六区，三鸚鵡、三奔狮间隔刻于每区花草的中心部位。狮纹是唐代重要的瑞兽纹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的文化习俗以及宗教特征，狮子是来源于西域的朝贡贸易品。在印度，佛经中狮子在动物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大集经》卷十中云：“过去世有一头狮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王，力能视护一切诸兽。’”<sup>[1]</sup>我国佛教思想主要来自于印度，唐朝南丝路沿线除贸易文化交流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印度佛教文明在南丝路沿线的传播。印度密教通过藏印线传至吐蕃与本地的苯教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并沿南丝路传播到唐朝蜀地最终传入长安形成了影响我国深远的佛教。在波斯狮子的崇拜也是源远流长的，古代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撰写的《王书》中英雄人物皆冠以“狮子”的雅称。大食国的立国传说与狮子的神谕有关。由此可见西域的贡狮都是在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下传入唐朝。但无论是印度狮子还是波斯狮子都是外来文化需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制约，因此经过长期的融合和改变张牙舞爪的波斯狮纹设计样式变得一团和气，口吐赤白舌的印度狮子转变为微露齿，总体形成富有自己文化底蕴的本土狮子纹样。主要特征有三，其一是狮在龙下，因为龙在古代中国的世俗封建文化中是王权的象征；其二是威而不怒，将印度传至唐的吐舌狮纹改变为张口露齿；其三，人狮和谐，在波斯纹样设计中常见人和狮子搏斗的画面，在中国文化传统奉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到晚唐时这类纹样设计就不常出现。



图 3.36 西安摩羯纹金长杯图



图 3.37 丁卯桥鎏金摩羯纹银盆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1] 萨尔集. 大方等大集经[M]. 上海: 中西书局, 2000. 2

摩羯纹也是我国唐朝最盛行的一个纹样，在金银酒器中它也屡屡出现。摩羯莲瓣纹银碗、西安摩羯纹金杯（见图 3.36）、摩羯纹海棠形高足银长杯、丁卯桥鎏金摩羯纹银盆（酒樽）（见图 3.37）、摩羯天马纹莲瓣银碗、摩羯鸳鸯纹莲瓣银碗、摩羯纹长金杯、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凯波高足银杯中都出现了摩羯纹的设计。摩羯实际上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精怪，不是真实的动物，常出现于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作品中。从印度通往大唐的路线有四条，其一是从印度半岛东南部的科罗曼德耳海岸出发经由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或者泉州等港口；其二是经由缅甸穿过横断山脉进入南诏国最后抵达属地再入长安；其三是经过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吐蕃最后入长安；其四就是玄奘取经时所走的北丝路，从长安经过玉门关，沿着天山翻越帕米尔高原，再曲折南下到达印度。<sup>[1]</sup>从印度输入的物品除了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以外还有乐器、歌舞、绘画、雕塑。阿富汗伯格拉姆地区发现的贵霜时代文物，以及中亚撒马尔罕的肯特粟特人遗迹，都有这种摩羯纹的设计出现，因此，很有可能是中亚是粟特人传入。<sup>[2]</sup>在位于印度河南岸的夏提欧地区发现大量粟特铭文，当时的粟特人应是在此地与印度人进行贸易往来，然后裹带着印度文化进入唐朝。摩羯纹设计成鱼身鱼尾组成，身体巨大，面部长着长鼻子和尖利的牙齿，两只眼睛怒目圆睁，性情恶劣。进入唐朝后逐渐中国化，晚唐时丁卯桥鎏金摩羯纹银盆（酒樽）上的摩羯纹被设计成身后有双翼，而鲤鱼的身尾则布满鳞片，身姿灵活的戏宝珠的样子。摩羯纹有吉祥和平步青云之寓意因此不仅在金银器中用作装饰纹样还常设计成瓷器的装饰纹样。



图 3.38 何家村莲瓣纹八瓣金杯及纹样

[1] 王茹芹. 中国商路文化[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10.

[2]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5.



图 3.39 鹦鹉纹提梁银罐及纹样

（图片来自：《鹦鹉花间春意闹——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纹饰“时乐鸟”》）

鹦鹉纹，据记载在《异物志》中被称为“灵禽”，因毛色艳丽漂亮还可学人说话，成为贵族的宠物，唐朝颇为流行。鹦鹉纹象征着智慧吉祥，在印度佛经故事中是仁义、孝顺的形象，主要出现在中晚唐金银酒器的装饰设计中，这和西方国家对唐的朝贡贸易交往分不开。《旧唐书·玄宗上》有南天竺国进献五色鹦鹉的记载，《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载：“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贞观）五年，又献五色鹦鹉。太宗异之，诏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又献白鹦鹉，精识辩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还林藪。”又载：“陀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贞观）二十一年，又遣使献白鹦鹉及婆律膏。”<sup>[1]</sup>《新唐书·西域传》记载有：“七年，诃陵施主捺塞因吐火罗大酋罗摩献狮子、五色鹦鹉。”<sup>[2]</sup>外来鹦鹉调动了唐人的设计创造力，使得鹦鹉纹的设计大致有两种类别：一是用作辅助纹样，鹦鹉纹通常用在器物边缘的装饰设计中，造型设计比较写实。二是用作主题纹样，纹样设计采用了分单元的整体布局方式，并保留出较多的空白。最典型的辅助纹样设计案例就是在何家村出土莲瓣纹的八瓣金杯中一个莲瓣上的图案，一只鹦鹉圆睛钩着嘴，双翅张开，长尾部上翘头部微微下视，双脚踩在圆形花朵上（见图 3.38）。造型生动自然，宛如一幅白描的写生作品。而鹦鹉纹提梁银罐的主体图案是两组鹦鹉，周围有一圈折枝纹，平盪手法柔和给人一种瑞庆祥和的感觉（见图 3.39）。二者都是所饰折枝

[1] 刘昫.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 (宋)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西域传[M]. 上海: 中华书局, 1975.

花卉的阔叶大花，同时折枝纹肥厚且繁茂，鸚鵡形体则比较写实，体形饱满，曲线流畅，疏密有致，这都是八世纪中叶之后普遍的设计样式。而到了晚唐，鸚鵡纹饰已倾向于抽象风格。丁卯桥的出土器物中就有许多鸚鵡纹饰，它成双成对地出现于花枝之间，钩喙并不突出，但体型却显得更加修长，尾部也状如花枝，变得更加图案化，略显呆板与僵硬，这和唐朝晚期金银酒器大多设计制造于南方有很大关系。

唐代金银酒器纹样中的人物纹分为狩猎纹、侍女纹、伎乐纹和舞伎纹四大类，均取材于唐代社会中现实生活主要内容，因为受到西域设计风格的影响而独具特色。由于人物纹的设计多和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从人物纹的外貌、服饰、鏤刻的内容、结构等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体现着设计与现实生活之间应有的对应，也因此有着很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其中以狩猎、仕女、乐伎为设计素材的是上层皇室贵族所喜爱的纹样类型，可以说此时唐代的设计风格在帝王贵族的偏好下开始出现世俗化倾向，例如沙坡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何家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北京大学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见图 3.40）、凯波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何家村伎乐纹八棱金杯、白鹤狩猎纹弧腹银高足杯、何家村鏤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等都是这种倾向的具体体现（见图 3.42）。而刻画人物故事、游玩、反映民间世俗的画面的属于八世纪中叶以后，此时期南方受战乱影响小，社会相对稳定，金银器的设计制造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制作金银酒器的私营作坊为得到更好的销路，酒器纹样的设计多选择百姓喜闻乐见，反映世俗生活的内容，例如丁卯桥童子纹三足银壶（见图 3.41）。



图 3.40 北京大学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



图 3.41 丁卯桥童子纹三足银壶



图 3.42 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

（图片来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对于唐代金银酒器设计来说，西方对中国的作用是主要的，而影响是相互的。丝绸之路输入了西方的设计理念，同时也输出了唐朝的设计思想。文明的交互因此得以现实化。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都有中国金银酒器出土亦或者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发新貌的西方金银酒器出土。在金银酒器设计中，西方设计或多或少地与中国传统设计文化因素进行融合。例如唐代的筒形杯体和圆底碗形杯体是七世纪至八世纪唐代创新造型设计，八世纪中叶以后，粟特带把杯没有延续原有设计风格的八棱形带把杯的造型设计样式，而是融合了唐朝的设计特点设计出了新的造型。

唐代金银酒器纹样设计清晰的表现出不同区域的习俗风情，在唐的中前期金银酒器的设计制作一般集中在北方的长安地区，并且由中央官府组织实施，受游牧民族的设计理念和西方设计文化影响较深，整体设计风格呈现出豪迈、粗犷、华丽、丰富且饱满，充满异域风情。随着金银酒器设计制作的地域范围逐渐的扩大至南方地区后，南北地区纹样设计风格开始具有差异性。南方金银酒器的纹样设计则呈现出简约、布局利落清爽、有大量留白、纹样典雅清隽。不同地区的纹样样式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影响，而西方的设计文化也对中国的设计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在酒器的口沿、折腹处以及圈足等部位的设计中出现了大量的葡萄纹、联珠纹等纹样设计作为边饰。另外，还出现了从西方朝贡而来的各类动物形象，用于金银酒器表面的装饰性成分。由金银酒器鲜明的纹样设计特征中充分的体现了唐代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汲取的设计思想、设计表达形式并融合中国本土的设计传统和理念进行了中国化的改进，成为中国传统设计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在唐朝统治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金银酒器经历了“拿来主义”一仿制一融合一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可以借助材质、工艺、造型、纹样的特征分析出金银酒器设计在丝路贸易大背景下的形成因素。唐代金银酒器设计的辉煌成就带给当今设计制造业在“一带一路”大环境下太多的反思与启示。

## 结 语

唐代金银酒器是唐朝设计和一个时代精神的凝聚体,是大唐风貌重要的物化产物。唐代金银酒器的制作工艺、纹饰设计、造型设计等均承载了大量有关唐代丝路贸易的史料信息,它对于中国设计的价值,已然超出了器物本身的使用价值,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国人的设计思想观念。使中国传统设计在缺少内在自我发展动力时,找到了一个打破陈旧规则的方法。为当代人研究并感知唐代的宗教、外交、经济、文化、审美、生活习俗及唐人的独特气度与风貌,提供了一个来自设计学的路径。同时也从唐朝金银酒器设计制造在丝路贸易背景下发展演进的史实中形成相应结论:当代设计需要有效汲取外来设计文化要素,与之融合,推陈出新,把器型、材质的实用性和纹样民族化、个性化的设计表达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具有长期使用价值和时代特征的经典设计作品。

“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从唐代金银酒器设计中可以看出人们不满足于对贸易中物品的渴求,而是通过器物本身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审美等内容,来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好奇和向往,以此寻求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的结合,实现思想的升华。任何一个社会发展,一种文明的延续,都基于自由流动开放,这就是文明传承、传播和发扬的真实规律。不同文化虽有姹紫嫣红之别,但却无高低好坏之分,彼此之间包容互鉴、择善而从,是不同文化相互学习提高、共同进步的不二法门。具体而言,唐朝仿制和创新的金银酒器设计可以回答中国设计最终接受哪些从丝路而来的设计样式、设计方法和设计思潮,为何会这样选择,又如何融合这些外来的设计要素与中国设计的传统。如此,唐代金银酒器在发展成为了人类设计的优秀产物和大文化语境中的瑰宝;证明了中国古丝绸之路的成功;也启示了如今中国丝路贸易的价值——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1]程旭. 从何家村到法门寺:金银器工艺的进步与发展[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6.
- [2]董诰. 全唐文. 卷 0744: (唐) 卢求. 成都记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3]樊绰. 蛮书[M]. 北京: 中国书店, 2007.
- [4]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形纪[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5]高兴. 设计伦理研究[D]. 江南大学, 2012.
- [6]高兴, 周瞳, 王磊. 中国设计史[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
- [7]高兴, 周瞳. 中国古代设计通史[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20.
- [8]郭范琳. 唐代金银器中的粟特文化因素研究[D]. 西北大学, 2016.
- [9]蘅塘退士,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 (唐) 张籍. 凉州词三首[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4.
- [10]韩伟.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 [10]刘昉. 旧唐书: 李裕德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1]李昉 (宋).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2]李林甫 (唐). 唐六典·卷四礼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3]刘丽文. 奢华的大唐风韵镇江丁卯桥出土的唐代银器窖藏 (下) [J]. 收藏, 2013.
- [14]刘思. 粟特文化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D]. 武汉理工大学, 2017.
- [15]欧阳修, 宋祁 (宋). 新唐书·西域列传卷二百二十一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6]彭紫君. 西安南郊何家村金银器纹饰考[D]. 湖北美术学院, 2017.
- [17]屈小玲.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古国文明与文明传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18]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9]齐东方. 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J]. 考古学报, 1998.
- [20]齐东方, 张静. 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J]. 考古, 1998.
- [21]齐东方. 丁卯桥和长辛桥唐代金银器窖藏刍议[J]. 文博, 1998.

- 
- [22]司马光(宋).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23]萨尔集. 大方等大集经[M]. 北京:中西书局, 2000.
- [24]申秦雁. 对唐代金银器工艺的几点认识——文献结合实物的一种观察[J].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2014.
- [25]王茹芹. 中国商路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 [26]王保定(五代). 唐摭言·第一五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 [27]吴婉莹.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装饰纹样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 [28]王雪. 唐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D].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5.
- [29]姚汝能(唐). 安禄山事迹[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0]扬之水. 晚唐金银酒器的名称与样式[J]. 中国历史文物, 2008.
- [31]张佳. 鸚鵡花间春意闹——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纹饰“时乐鸟”[J]. 文物天地, 2020.
- [32]朱天舒. 唐代金银器与大唐气象[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 [33]赵瑞廷. 唐代金银器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承接[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 2006.

---

## 后 记

总以为来日方长，却不想时光早已偷偷溜走。行文至此，我的研究生生活也即将落幕。始于二零一九年秋，终于二零二二年夏。但我的人生还将继续，人生中总是在反复的选择后去遇见和离别，这是漫长的故事。三年所遇所识师友莫不有恩于我，故提笔静思致辞感谢。

一谢师父高兴、师娘周瞳。导吾以狭路，示吾以通途。亦师亦父亦友，承蒙先生不弃。我本愚钝，幸得师父师娘爱护有加，不离不弃。师父学识渊博，平日为我传道、授业、解惑，遇人生大事之时于我指点迷津。师娘温柔细致，生活中对我呵护备至，学业上对我耐心教导，从未责备，多是鼓励。得遇良师，何其有幸，师恩难忘，铭记于心。

二谢父母。感谢父母对我一切决定无条件得支持，父母养育之恩，无以为报。

三谢同窗挚友张颢。在我学习中鼓励我，在生活中关心包容我，三年陪伴，共策共励。

感谢自己一路走来足够坚定，期望自己再接再厉。去日不可追，来日犹可期！